



中国教育科研参考

2021年第09期

总第(499)期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编

2021年05月15日

目 录

- “双高”建设背景下高职院校治理能力提升研究.....周建松 (02)
“双高计划”建设项目特征与遴选机制分析.....陈友力 叶赋桂 (07)
新时代“双高计划”学校建设推进逻辑与实践路径.....刘文杰 陈亮 (12)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项目分析.....郭福春 许嘉扬 王玉龙 (16)
“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路径李梦卿 邢晓 (21)
“双高”建设校的群像特征与建设启示
——基于浙江省的分析.....程江平 麻来军 (28)

编者的话：“双高计划”是我国新时代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2019年3月，教育部、财政部发布《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明确提出要“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职学校和专业群，带动职业教育持续深化改革，强化内涵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双高计划”的实施承载着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现实需要，也是对职业教育类型教育属性的积极确证。在全面推进“双高计划”的关键期，为准确把握“双高计划”内涵，探索“双高计划”建设应遵循的逻辑及建设实践路径，本刊以“双高计划”为选题，集中选编若干文章，供读者参阅。

主编：王小梅

本期执行主编：王者鹤

责任编辑：段爱峰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5号世宁大厦二层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

邮编：100191

电话：（010）82289239

电子信箱：gaoyanbianjibu@163.com

网址：www.cahe.edu.cn（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动态栏目）

“双高”建设背景下高职院校治理能力提升研究

周建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专门研究部署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这对于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何结合“双高”建设，将我国高职院校的内部治理水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与切实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充分认识高职院校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意义

衡量一所学校办学水平的高低，判断一所学校是否为一流学校，除了一些显性指标外，还有隐性指标。治理能力作为一项颇具代表性的隐性指标，对高职院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治理能力高低是衡量高职院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

评价一所学校的优劣，最为经典的是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梅先生充分强调了大师的重要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在充分肯定大师重要性的同时，不断有人强调大楼（物质设施、办学条件、经费保障）及大爱（大学文化、师德师风、尊师重教）等的重要性，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大楼、大师、大爱”均是衡量学校优劣的显性指标。

高职教育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目前学校数量和学生规模已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在这一背景下，关于高职教育的各种排行榜也层出不穷。一般而言，位居排行榜前列的应该是办学水平相对较好的学校，这符合总体规律。而真正衡量一所高职院校的办学水平需要关注以下八个方面。第一，人才培养质量佳，具体表现在毕业生就业率、签约率及用人单位满意率及岗位发展能力。第二，专业建设水平高，具有一批招生受青睐、就业受欢迎、办学实力强且有特色的专业。

第三，社会服务能力强，学校在多层次培训和服务行业区域发展过程中能展现较强的实力，在科学的研究中也有较多的成果。第四，师资队伍水平较高，学校拥有素质优良、结构合理、数量充足的专任教师，并具有一大批理念认同、数量适当的兼职教师。第五，校企合作紧密，学校贯彻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原则，拥有一大批紧密合作伙伴并积极发挥育人功效。第六，办学基础条件实，学校既有现代化的校园建筑及技术先进的实验实训设备、拥有充裕的财政保障条件，也有较强的资金筹措能力。第七，学校治理水平高，学校能正确处理好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民主权力及师生发展权利的关系，保证党委政治权力不偏、师生发展权利不缺，并形成同心发展最大公约数，包括有比较好的投入产出绩效。第八，外部品牌声誉美，学校能正确处理与党政部门、社会各界及新闻媒体的关系，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和品牌影响力。一个学校的品牌和声誉是综合的，而治理能力和水平对其他方面具有重要影响。

（二）高职治理能力提升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体现

无论是有关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文件，还是国家关于“双一流”和“双高建设”的有关文件，都将治理体系建设、治理能力提升、治理现代化等问题摆上重要议程。首先，《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要求我国教育率先实现现代化，其中包括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务院发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明确把“完善内部治理结构”作为改革任务之一，具体包括以章程为统领的制度体系建设、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管理体系、以教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管理机制建设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要

健全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体制机制，依法落实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改进高等教育管理方式，不断提升治理能力。教育部、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实施意见》明确把“提高学校治理水平”作为改革发展的十大任务之一。这些足以证明党中央、国务院对学校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的重视。

高职院校作为一个微观单位，其治理能力和水平既是整个国家推进治理现代化的基础环节，也是国家优化治理结构和水平的重要内容。目前大部分高职院校具有千亩校园、万名学子，并进入内涵发展阶段，正在朝着类型特色鲜明、中国一流乃至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前进。在这一新时代、新阶段，内部治理体系构建和治理能力提高应该被纳入内涵建设内容，同时也应该成为学校改革发展的重大任务。关于这一点，无论是从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战略布局”的要求，还是从推进实现国家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高职教育的内涵建设和特色办学等要求来看，都是有意义且必要的，必须被纳入重要议事日程。

二、深刻理解“双高计划”对治理能力提升的内涵表述

“双高计划”明确了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更明确了学校开展的改革任务，其中任务八“提升学校治理水平”又可细分为六个方面的内容。深刻理解文件表述，是未来高职院校提升治理能力的前提。

（一）完善以章程为核心的现代职业学校制度体系

任务八的第一款明确提出“要健全内部治理体系，完善以章程为核心的现代职业学校制度体系，形成学校自主管理、自我约束的体制机制，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毫无疑问，将章程建设视为“提升学校治理水平”的首要要求是正确的。完备的章程建设和良好的章程执行是学校贯彻依法治国思想的重要体现，必须贯穿于学校运行的各个方面。

一要重视章程建设程序。章程建设程序要规范，要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具体落实《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努力做到定位准、内容全、程序规、核准到、监督力。尤其要将《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已经明确的内容清晰地体现在章程中。要写明“公办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写清建立学术组织、教职工代表大会等要求，明确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明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基本使命和职责。章程既要具体明确，也要抓大放小，经规范程序讨论通过并经核准后要及时公布、严格认真宣贯及执行。二要强化章程执行力度。要提高以校长为首的行政管理体系对章程的敬畏感和执行力，学校要设立章程执行监督小组，由校长每年向教职工代表大会报告章程执行情况，使章程的执行具有严肃性，真正做到按章程办事，发挥章程的刚性约束力、强制执行力。三要弘扬遵章办事精神。要提倡学习章程、尊崇章程、遵守章程，自觉形成弘扬章程的良好校风。应按正常程序修订不完善、不适时的章程，修订时坚持科学规范和程序严格，一经确定必须严格遵守。从某种意义上说，章程建设水平体现了学校的整体治理水平。

（二）健全校、行、企、社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校理事会

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文件都强调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双高计划”也要求坚持产教融合，创新高职教育与产业融合发展的运行模式，精准对接区域人才需求，提升高职院校服务产业转型升级的能力，打造高职院校和行业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基本特征，也是“双高计划”的基本要求，为此，必须在治理体系建设上提供组织保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认真组建学校、行业、企业、社区共同参与的理事会或董事会，以发挥对办学治校、管理运行、专业建设等方面

的咨询、协商、议事和监督作用，从根本上促进产学合作，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三）设立统筹行使学术事务职权的校学术委员会

“双高计划”在“提升学校治理水平”条款中明确说明“设立学术委员会，统筹行使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应该说，学术权力是高职院校作为高等学校的重要特征，是构建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重要原因所在。高职院校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其学术性，确保相应的学术地位，将学术委员会建设作为行使学术权力的重要载体，通过学术委员会将“教授治校”落到实处。要认真贯彻落实《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并结合高职特点和本校实际制订具体可行的、有可操作性的学术委员会章程，明确总体目标、组成规则、职责权限、运行制度等，明确对哪些学术问题做出决策、对哪些问题进行审议、对哪些事由进行评定、对哪类事项进行咨询，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风建设、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学术评审、成果转化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四）设立校级专业建设委员会和教材选用委员会

“双高计划”的一大创新点是强调“设立校级专业建设委员会和教材选用委员会，指导和促进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这既说明专业建设在高职院校办学治校中的重要性，也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教材建设和选用工作的重要性。

在职业教育发展之初，随着规模扩大和内涵建设深入，尤其是明确打造类型特色要求后，高职院校对专业建设重要性的意识逐渐提高。为此，教育部、财政部不断通过项目引领的方法推动高职教育专业建设，从21世纪教改项目到国家示范校、骨干校建设，从专业服务产业升级项目到高职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进一步将重点、特色、优势、骨干专业放到重要位置。新时代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更是直接采用“双高计划”这一形式，再次把高职教育的专业建设提到新的高度。学校从治理层面建立专业建设委员会，对

专业的设立、结构优化和布局调整进行审议。这既有利于正确处理好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充分发扬学术民主，也有利于不断提高专业建设水平。专业建设委员会不仅要正确处理好与学术委员会的关系，也要借鉴校企合作理事会中的部分合理内核，积极吸纳来自产业一线和行业企业专家的意见建议，从而更好地推进专业建设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需要。

关于教材选用，以往虽对教材建设有一些要求，但将其上升到学校治理高度还是第一次。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多次强调“经济建设是我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为确保意识形态工作符合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要求，党中央明确要求建立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重视思想政治课建设，强调积极开展课程思政并加强教材建设。为此，国家建立了教材建设委员会，教育部设立了教材局，强化了教材编写、出版、发行、印刷管理机制，并对各校教材选用提出了要求。“双高建设”学校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在学校党委领导下，建立由宣传、教学等多部门参加的教材建设与选用委员会，并确保其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

（五）发挥好教代会在审议学校重大问题中的作用

“双高计划”在提升学校治理水平条目中明确强调“发挥教职工代表大会作用，审议学校重大问题”。这实际上包含多层含义：首先，必须建立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其次，要发挥好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最后，强调重大事项决策要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应当说，教育行政部门和高等学校对于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一直是比较重视的。早在2011年，教育部就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第32号令的形式正式发布《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文件明确了基本要求、职权、代表产生、组织规则、工作机构等内容。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各校实施的情况不尽相同，但一般而言，每年开年初召开一次教职工代表大会，同步召开工会代表大会，讨论审议的内容一般为“1+1+1+X”：第一个“1”是校长工作报告，

第二个“1”为学校财务预决算报告，第三个“1”为工会工作报告，“X”则为学校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事关教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一些学校也通过代表提案的方式进一步反映教职工的诉求，有些提案经大会主席团确认后由有关部门研究落实，有些提案则供有关部门参考。教职工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在工会工作办公室，教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在校党委领导下进行。会议方案由党委审定，按程序产生大会主席团，主席团领导大会工作。主席团应由党政工团和高层次人才代表组成，以体现群众性、民主性。

（六）建立健全学校院系两级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双高计划”在提升学校治理水平第六款进一步强调“优化内部治理结构，扩大二级院系管理自主权，发展跨专业教学组织”，这实际上是行政管理组织体系中的组织设置和二级运行机制问题。

一要优化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学校层面，要在学校党委统一领导下，认真把握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制的正确内涵，建立健全党委会、校长办公会议议事规则和决策机制，建好学术委员会并正常发挥作用，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体制机制，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要适应高职教育特点和要求，建立健全校政行企理事会。要建好教材选用委员会，突出强化专业建设委员会职能，使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民主权力正常运行、相互约束，形成最大公约数，为学校发展画出最大同心圆。二要积极创造条件推进校院两级管理。当学校办学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尤其是学校进入内涵发展和质量创优阶段，从有利于推进管理机制优化、提高管理效能，有利于调动基层办学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产学研合作等多角度看，必须改变集中于一级的粗放式管理模式，积极构建两级管理新机制。在学校发展规模达到万人、教育部着力推进以专业群为基础的“双高”目标战略时，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在推进校院两级管理上加大力度，真正让人、财、物向基层延伸。三要完善二级管理体系。随着校院两级管理体制的推进，院级单位逐渐从教学实体向办学实

体提升，这就要求院级单位必须拥有人、财、物的自主权，同时配备相应的管理力量。要建立党政工团组织体系，完善院长办公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按照中央的要求，二级院系目前实行党政共同负责制，因此，要规范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配强配足党政班子尤其是主要领导，配备适量的管理服务人员，以确保二级管理运行顺畅、工作到位。四要发展跨专业教学组织。对跨专业教学组织这个问题目前尚存在一定争议。有专家认为，专业群组建前可以跨学院，组建后应及时调整到位；也有专家认为，为提高管理效能、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准，我们始终需要保持并发展跨专业、跨学科的教学科研组织，通过柔性团队的方式推动教育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开展。跨专业教学组织要从实际出发，因校而宜，适度保留和发展。

三、着力抓准高职院校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节点

“双高计划”对提升学校治理水平的要求，重点是围绕治理结构和治理内容展开的。作为一项工作要求，它无疑是十分必要和正确的，我们应当努力按此建设。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一流大学必然有一流的治理，建设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实际上就是建设全国乃至世界一流的职业院校。对此，“双高计划”表达得十分清楚，“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正因如此，我们必须抓准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效能三个方面的关键节点，以整体提升高职院校的治理能力。

（一）创新治理理念：围绕核心价值确立善治为本的治理观念

善治是治理的一种高阶形式，其基本含义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并非仅指一种管理时尚，而是社会发展进步到一定阶段的需要和产物，其本质上可以理解为若干核心价值观在治理过程中的体现，即要求在实现治理目标的过程中更加强调法治、更加民主、更具效率。因此，结合高职教育发展实际，确立以善治为导向的治理观念，必须把握好以下四点核心价值观：一是坚持法治性，即强调治理过程和治理

依据，强调依法办事，尤其要强调认真贯彻国家的法律和法规。对于学校组织而言，还要重视章程的作用，以章程来统领学校各项工作的运行，维护章程的权威，强化章程的作用。二是提倡民主性。在高校治理体系中，党的领导是一个重大政治前提，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要正确处理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之间的关系，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充分发挥民主，提高政策的最大受惠面和受惠率。三是强调包容性，坚持在治理过程中强调尊重个性、尊重差异，坚持激励兼容、有奖有罚、以奖为主，以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尤其是高层次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四是注重整体性，即强调学校内部各主体之间、学校与发展利益相关方之间是一个整体。要讲究整体认同，尤其是在教师、学生、校友三者之间坚持教师为基、学生为本、校友为宗，致力于打造教师、学生、校友发展共同体。

（二）优化治理结构：聚焦类型特色完善校本治理框架与结构

总体而言，我国高职院校的治理结构大多数是参照大学制度建立的。高职院校在发展初期，通过仿效大学制度，逐渐具备了高等教育形态，实现了办学升格、管理升级。然而，随着类型特色目标的确立，我们必须对传统的治理结构进行优化，研究建立与高教性和职教性双重属性匹配的治理结构，即从构建基本的治理框架、打造特色的治理结构两个层面出发优化治理结构。

一是构建基本的治理框架，即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四大支柱：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在党委领导校长负责的体制内正确处理各种关系，强调以书记、校长为首的领导班子精于治校，以学术委员会为载体体现的教授精于治学，以一大批敬业爱岗的行政服务工作者精于治事，形成高水平学校的基本结构，体现结构现代化。具体说来，要坚持“一个前提”即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学校各项工作，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持“三重一大”党委决策制度。二是打造特色的治理结构。高职院校治理必须重视企业的

参与，从某种意义上说，要通过校政企的合作，通过企业代表参与学校治理，改善学校的发展环境，从而提升学校的治理效能。此外，学校接受财政拨款，使用纳税人的钱，也必须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考核投入产出绩效。因此，现代治理结构建设还需要接受社会监督，由此形成“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企业参与、社会监督”的治理新结构，其中，党委领导是核心、校长负责是关键、教授治学是基本、民主管理是基础、企业参与是特色、社会监督是保证。

（三）激发治理效能：提升全员素质推动治理工作落实落地

先进的理念需要靠人来执行，完善的结构也需要人去运行，完善治理理念、结构框架、运行机制等固然重要，但更新人的思想、提升人的能力更是当务之急。对于高职院校来说，上至领导班子的整体水平，下至一般行政管理人员的服务能力，都是高职院校提升治理效能的重中之重。

一要加强学校领导班子建设。领导班子在学校改革发展和运行中起着重要作用，必须按照中央的要求，按照社会主义政治家和教育家的要求抓好落实，坚持忠诚担当、学习研究、开拓创新、服务示范、勤勉清廉的要求，提升领导班子的个体和整体水平。二要加强中层干部能力建设。中层干部在学校组织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必须培养好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敢于担当、能力突出的中层干部队伍，尤其要培养其学习创新能力和大局观念。从当前看，在青年教师干部队伍中培养一支面向2035年能担重任的人更为必要。三要注重管理服务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建设高水平高职学校，关键在于高水平师资队伍，这无疑是正确的，也应当是我们的工作重心。但是，从提高治理水平角度看，我们也必须培养好忠于职守、办事有力的行政管理人员，从而把提升学校治理水平工作落到实处。

（周建松，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党委书记、教授，浙江杭州 310018）

（原文刊载于《教育与职业》2020年第14期）

“双高计划”建设项目特征与遴选机制分析

陈友力 叶赋桂

2019年12月，教育部、财政部正式发布《关于公布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建设单位名单的通知》（以下简称“双高计划”建设），立项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建设单位197所，其中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56所，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141所。这是继国家示范性（骨干）高等职业院校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国家示范（骨干）校）以来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又一重要战略部署。国家重点支持一批高水平高职学校和高水平专业群，通过中央财政的投入引导地方支持高职发展，以点带面，引领新一轮改革建设，进一步带动提高中国高职教育的整体水平。“双高计划”建设项目对高等职业教育资源重新做了怎样的资源配置？其资源配置的分布呈现怎样的变化和特征？“双高计划”建设项目与以往的国家示范（骨干）校建设项目政策是否存在内在延续性，做了哪些调整，依然存在哪些问题呢？本研究采用比较政策分析的方法进行实证和理论研究，首先基于全面收集的197所“双高计划”建设单位的数据进行多维实证分析，比较政策目标与遴选结果的契合度；进而从项目制的视角研究“双高计划”的遴选特征和遴选机制。

一、“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分布分析

“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名单包括56所高水平高职学校和141个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高职学校，共计197所高职学校。对照《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项目遴选管理办法（试行）》和《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建设单位名单》，发现有两个变化。一是建设单位是按照先类别等级划分，再依次按照学校、专业、档次排序。根据《遴选管理办法》规定：依据学校和2个专业群赋分综合排序，确定高水平学校推荐单位，推荐结果分为三档，A档10所、B档20所、C档20所左右；依据学校和1个专业群赋分综合排序，考虑产业布局和专业群布点，确定高水平专

业群推荐单位，推荐结果分为三档，A档30所、B档60所、C档60所左右。而教育部在公布的建设单位名单将入选学校及专业群分成四类：第一类为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A档）10所；第二类为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B档）20所；第三类为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C档）26所，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A档）26所，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B档）59所；第四类为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C档）56所。值得注意的是，将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C档）与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A档）放在同一类别等级中，这就意味着在未来建设中将会同等对待和资金投入。二是建设单位档次数量有变化。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数量由50所增加到56所，A档10所、B档20所没有变化，但是C档由20所增加到26所。这就表明“双高计划”建设项目遴选在坚持扶优扶强、质量为先、效率优先原则的同时，兼顾教育公平，兼顾区域和产业布局。

二、结构特征分析

（一）入选学校与国家示范（骨干）建设学校分布分析

从“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名单来看，全国共有145所国家示范校、骨干校入选，特别是入选的56所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全部是国家示范校和骨干校。这表明2006年以来，由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实施的国家高职示范（骨干）校建设项目成效显著，培育了一批高水平的高职院校，充分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1. 国家示范校占据优势，内部出现一定分层。国家示范校入选高水平高职学校和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总数为76所，其中有42所入选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占建设单位总数的75%。高水平高职学校中A档全部被示范校占有，B档入选15所，占比75%，C档入选17所，占比65.4%。总体看来，国家示范校在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占据绝对优势。另有34所国家示范校入选高水平

专业群建设单位，占建设单位总数的24.1%。其中A档入选15所，占比57.7%，B档入选12所，C档入选7所。可见，国家示范校占据优势，但内部也出现一定分层。国家示范校建设项目是国家大规模中央财政支持的建设项目，在当时都是综合实力很强的学校。经过十余年的大浪淘沙，已有部分学校不能适应新时代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而落伍了。除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和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已升本，没有申报外，只有76所国家示范校入选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和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仅占入选总数的38.6%，已有20多所学校被淘汰出局。

2. 国家骨干校表现突出，发展态势良好。国家骨干校入选高水平高职学校和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总数为69所，其中14所入选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占总数的25%。国家骨干校中有5所入选B档，占比25%；9所入选C档，占比34.6%。另外55所入选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占总数的39%。其中A档入选10所，占比38.5%；B档入选34所，占比57.6%；C档入选11所，占比19.6%。可见，国家骨干校在入选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中占据优势，入选数比国家示范校多20所，发展态势良好。

3. 非国家示范（骨干）校异军突起，表现抢眼。虽然非国家示范（骨干）校没有入选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但在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中表现不俗。在141所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中，非国家示范（骨干）校有52所入选，占比达36.9%，比国家示范校多入选18所，与国家骨干校大致相当。

（二）入选学校类型与产业发展布局分析

1. 从入选学校类型来看，理工类高职院校占据优势。从入选“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学校所属类型看，理工类高职院校有105所，占总数的53%；综合类高职院校有50所，占总数的25%；财经类高职院校有17所，占总数的9%；农林类高职院校15所，占总数的8%；医药类高职院校5所，占总数的3%；艺术类高职院校4所，占总数的2%；政法类高职院校1所。可见，理工类高职院校占据优势。

2. 从入选学校专业布局来看，服务面向国家

重点产业。从专业布局看，申报的389个专业群覆盖了18个高职专业大类，布点最多的五个专业大类分别是装备制造大类、交通运输大类、电子信息大类、财经商贸大类、农林牧渔大类。从产业布局看，服务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业群有113个，面向现代服务业的112个，面向先进制造业的100个，面向现代农业的32个，其他32个。可见，入选的专业群是适应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需求，服务国家重点产业、区域支柱产业发展，为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供强有力支撑。

三、地域特征分析

（一）入选学校省域分布

1. 从入选总数来看，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等省入选的高水平高职学校和高水平专业群数量均位于前列。江苏省共有20所高职院校入选，其中，高水平高职学校数7所，高水平专业群数13所，三项指标数均居全国第一。浙江省、山东省各有15所入选，入选总数并列第二位。广东省共有14所高职院校入选，入选总数位居第四位。西藏和青海都没有学校入选。值得注意的是，在四个直辖市中，重庆入选数最多，达10所；北京、天津各7所；上海市仅有1所入选。

2. 从入选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看，江苏、浙江、广东、山东分别入选7所、6所、5所、4所，共入选22所，占入选学校总数的39%。值得一提的是，位居西部地区的陕西省有4所，表现出不俗实力。入选1所的省份达20个，可看出国家在坚持扶优扶强的同时，兼顾了区域平衡。从入选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看，最多的省份仍是江苏13所，其次是山东11所，浙江、广东、湖南、河北各9所，上海、海南都没有学校入选。（见表1）

总体来说，各省之间入选的高职院校数存在较大差异，最高省份有20所入选而最低有2个省份没有入选。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数和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数，也呈现省域分布不均的情况。

（二）入选学校区域分布

1. 七大区域分布分析。数据显示，华东地区、华北地区、华中地区位于入选建设单位总数的前三位。华东地区表现突出，三项指标均位居七大区域之首。入选建设单位总数67所，占入选

总数的34%；入选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数21所，占入选数的37.5%；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数46所，占入选数的32.6%。华北地区位列第二位，入选建设单位总数31所，占入选总数的15.7%；入选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数9所，占入选数的16.1%；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数22，占入选数的15.6%。华东地区和华北地区入选建设单位之和达98所，占入选总数的49.7%，其中，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数之和达30所，占入选数的53.6%。两个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表现强劲势头。华中地区虽然位居入选总数的第三位，但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数只有4所，落后于华南地区（7所）、西北地区（7所）、西南地区（5所）。西北地区入选建设单位总数（15所）和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数（8所）虽然最少，但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数却达到7所，与华南地区并列第三位。

2. 东部、中部、西部分布分析。按照我国行政区域通常的划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11个省、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8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等1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通过对197所入选建设单位进行数据分析，东部地区入选学校数达101所，占整体入选学校的51.2%。其中，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33所，占入选学校数的58.9%；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68所，占入选数的48.2%。三项指标均居首位，特别是入选学校总数及入选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数分别比中西部地区之和还要多。更为突出的是，在10所A档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中，东部地区就占了8所，中部和西部地区各1所。可见，东部地区占绝对优势。中部地区入选学校数达50所，占入选总数的25.4%。其中，高水平高职学校9所，占入选数的16.1%；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数41所，占入选数的29.1%。西部地区入选学校数达46所，占入选总数的23.4%。其中，高水平高职学校14所，占入选数的25%；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数32所，占入选数的22.7%。中部地区入选学校

总数比西部地区多4所，但西部地区入选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数多5所。可见，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入选学校数大体相当。就整体而言，东部地区无疑是“双高计划”建设单位的集中区，中西部地区是“双高计划”建设单位的“洼地”。

综上分析，遴选结果与政策要求是高度契合的。遴选结果遵循了《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关于项目遴选坚持扶优扶强的原则，即质量为先、以点带面，兼顾区域和产业布局，支持基础条件优良、改革成效突出、办学特色鲜明的高职学校和专业群率先发展，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从高水平高职学校布局看，197所学校覆盖了29个省份，既体现了质量，也兼顾了均衡。从高水平专业群布局看，覆盖高职19个专业大类中的18个，既体现了全面，也兼顾了重点。可见，遴选结果符合“双高”建设的多重政策目标，既追求中国特色、世界水平，又保持区域平衡和产业布局；

表1 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入选“双高计划”建设单位情况表

序号	省份	入选 总数	高水平高职学校				高水平专业群			
			A档	B档	C档	小计	A档	B档	C档	小计
1	江苏	20	2	3	2	7	1	7	5	13
2	浙江	15	2	3	1	6	1	4	4	9
2	山东	15	1	2	1	4	1	7	3	11
4	广东	14	1	4	0	5	0	3	6	9
5	湖南	11	0	1	1	2	3	2	4	9
6	重庆	10	0	2	0	2	1	3	4	8
6	河北	10	0	1	0	1	1	2	6	9
8	陕西	8	1	1	2	4	0	2	2	4
8	四川	8	0	0	1	1	2	3	2	7
8	湖北	8	0	0	1	1	2	2	3	7
11	北京	7	1	1	1	3	2	1	1	4
11	天津	7	1	1	1	3	2	1	1	4
13	河南	6	1	0	0	1	0	5	0	5
13	辽宁	6	0	1	0	1	1	0	4	5
13	黑龙江	6	0	0	1	1	2	2	1	5
13	江西	6	0	0	1	1	1	3	1	5
17	安徽	5	0	0	1	1	2	1	1	4
17	福建	5	0	0	1	1	1	3	0	4
19	山西	4	0	0	1	1	1	2	0	3
19	吉林	4	0	0	1	1	1	0	2	3
19	广西	4	0	0	1	1	0	2	1	3
22	甘肃	3	0	0	1	1	1	1	0	2
22	贵州	3	0	0	1	1	0	1	1	2
22	内蒙古	3	0	0	1	1	0	1	1	2
22	云南	3	0	0	1	1	0	0	2	2
26	宁夏	2	0	0	1	1	0	1	0	1
27	新疆	2	0	0	1	1	0	0	1	1
28	上海	1	0	0	1	1	0	0	0	0
28	海南	1	0	0	1	1	0	0	0	0

注：此表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公布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建设单位名单的通知》文件整理而成。

既突出效率优先，又兼顾教育公平。

四、项目遴选机制特征分析

项目制是指政府运作的一种特定形式，即在财政体制的常规分配渠道和规模之外，按照中央政府意图，自上而下以专项资金方式进行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项目制以项目的方式成为具有体制特征的治理逻辑和治理模式。在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历程中，国家先后实施了示范性职业大学建设、示范性职业技术学院建设、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国家骨干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优质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等项目。项目制引入高等职业教育以来，政府部门逐渐发展出一套严密而完备的项目制定、申请、遴选、立项、实施、考核、验收、审计制度，形成完善的技术治理系统，项目遴选是其中重要的环节。在“双高计划”建设项目的遴选过程中，教育部和财政部规定了项目遴选的工作原则，项目遴选的标准和程序，项目遴选的组织与实施。其遴选机制具有以下特征。

（一）突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发展

政府实施高等职业教育重点项目建设政策是在国家财政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遴选部分高水平高职学校和高水平专业群进行重点建设，通过资源投入的相对倾斜，将有限资源集中投向少数高水平高职学校和高水平专业群。“双高计划”建设以中国特色、世界水平为核心，注重扶优扶强。在遴选办法中，设置9项国家标志性成果，只有满足9项中的5项才能有申报资格。通过选择性激励政策工具的使用，支持基础条件优良、改革成效突出、办学特色鲜明的高职学校和专业群率先发展。在择优遴选的同时，考虑了地域发展、产业行业发展等因素，最终一批与国家重大战略布局密切相关但中西部地区实力较弱的高职院校进入了建设名单。从197所入选高水平高职学校和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来看，大部分示范校、骨干校入选“双高计划”建设名单也是符合预期，同时除西藏、青海两省份外，其他省份都有入选建设学校。

（二）加强动态调整与保持政策衔接

为防止身份固化，“双高计划”建设项目打

破了国家示范校、骨干校身份，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进入动态调整机制。从197所入选高水平高职学校和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来看，国家示范校入选学校数有76所，骨干校入选学校数有69所，非国家示范校、骨干校入选学校数有52所。原国家示范校、骨干校绝大部分入选“双高计划”建设名单，既是对国家示范校、骨干校建设项目成绩的肯定，同时也体现出“双高计划”建设遴选呈现路径依赖的特点，“马太效应”和身份固化问题依然存在。一旦某种制度或政策被行动者选择之后，制度或政策本身就会生成一种自我强化的机制。随着制度或政策执行时间的推移，退出该项制度或政策的逆转过程的成本将急剧增长，从而形成路径依赖。从国家示范（骨干）校建设，到优质校建设，再到“双高计划”，并不是简单的优中选优，而是以持续的政策供给，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推动职业教育发展。可见，“双高计划”建设项目是高等职业教育重点项目建设政策的延续，是与以往国家示范（骨干）校建设等重点建设项目的有效衔接。

（三）坚持专业群基础与注重综合实力

“双高计划”建设遴选由注重院校综合实力，向注重综合实力与突出专业群基础相结合转变。国家示范校、骨干校建设项目遴选侧重学校综合实力，“双高计划”建设坚持“以专业群为基础”原则，《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项目遴选管理办法（试行）》明确规定：专委会根据高水平学校和专业群遴选标准，分别对学校和专业群评价赋分。依据学校和2个专业群赋分综合排序，确定高水平学校推荐单位，推荐结果分为ABC三档；依据学校和1个专业群赋分综合排序，考虑产业布局和专业群布点，确定高水平专业群推荐单位，推荐结果分为ABC三档。这就意味着只有两个专业群同时入选高水平专业群后，学校总体才能入选高水平高职学校。在拨款机制方面，国家示范校、骨干校采取学校整体建设方式，以学校为基本资助单位，而“双高计划”建设是学校和专业群同时资助。

五、结语

在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过程中，国家采

取一系列政策推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其中以项目制的方式影响最大、效果最好。“双高计划”建设项目是自国家示范（骨干）校建设项目以来最大的高等职业教育重点建设项目。通过对“双高计划”入选建设单位的数据统计和项目遴选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 项目遴选总体达到预期效果，但仍呈现分布不均衡性。从“双高计划”建设项目的遴选结果和数据分析，基本达到预期效果，遴选出一批基础条件优良、改革成效突出、办学特色鲜明的高职学校和专业群，同时兼顾区域和产业布局，但也存在分布不均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从结构特征分析来看，虽然一些非国家示范（骨干）校入选，但国家示范（骨干）校在入选名单中占绝对优势。从地域特征分析来看，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等沿海发达省份入选名单最多，各省份入选名单数量存在较大差异，省域分布不均的问题仍存在，同时考虑了区域的平衡，除了西藏和青海，其余省份都布局。从区域布局来看，华东地区占据绝对优势，西北地区入选最少；东部地区占据绝对优势，入选数量比中西部总和还多，中西部地区仍是“双高计划”建设的“洼地”。

2. 项目遴选政策做较大制度调适，但仍保持政策延续性。通过遴选机制的分析发现，“双高计划”建设项目是高等职业教育重点项目建设政策的延续和调适，其本质上仍然属于高等职业教育财政专项投入政策。从延续来看，国家示范（骨干）校建设项目是“双高计划”建设项目的逻辑起点与基础，是新时代追求中国特色、世界水平高职学校的政府行为，代表着国家意志和战略意图；从调适来看，“双高计划”在注重效率的同时兼顾教育公平及区域和产业的布局，保持政策衔接的同时更加注重动态调整与绩效评价，注重综合实力与突出专业群基础。

3. 项目行动主体职责清晰，但仍要保持统筹协调性。“双高计划”建设项目的行动主体是中央政府及部委、地方政府及部门和高职院校，遴选立项后的建设需要充分发挥三个行动主体的作用。一是中央政府及部委发挥引导作用。通过中央财政专项支持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政

策杠杆作用，以整体性思维构建高等职业教育项目制治理模式，在强化重点、效率优先同时兼顾高等职业教育系统公平，建立有效的评价、监督、问责、退出机制，完善与之相匹配的信息核查反馈手段。组织一支具有权威性的第三方考评组织或委员会，定期对“双高计划”建设成果进行评价。在项目行动主体上，由政府控制向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竞争转变，以确保“双高计划”建设的高效推进。二是地方政府发挥省级统筹作用。地方政府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责任主体，要优化“双高计划”建设发展环境，统筹推进、协同推进，构建政行企校协同推进“双高计划”建设的新机制。加强配套资金和政策保障力度，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地方政府还可以适时出台省级“双高计划”建设政策，从而形成以国家“双高计划”建设项目为引领、以省级“双高计划”建设项目为带动的多层次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三是“双高计划”建设学校发挥能动作用。由于项目制的竞争机制与业绩偏好，组织的常态化制度将围绕项目实施过程而被重新塑造，因而诱致组织的内部变革。入选学校要充分认识到“双高计划”建设项目对高职院校组织变革即将带来的深刻变化，要通过组织学习实现组织变革。这不仅体现在理念认同、知识更新、培养流程和教学过程的再造上，还直接体现在院校组织结构的变化。“双高计划”建设学校应在价值目标与组织追求、价值判断与理性选择中找准自身定位，实现既定目标，服务国家战略、融入区域发展、促进产业升级，引领新时代职业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人才强国做出重要贡献，为世界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陈友力，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4；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发展规划与质量保障处副处长，重庆 401120；叶赋桂，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北京 100084）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2期）

新时代“双高计划”学校建设

推进逻辑与实践路径

刘文杰 陈亮

职业教育现代化是新时代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高职教育发展的核心主题。职业教育现代化不仅要关注规模、结构、质量等要素评价指标，还要着眼于我国经济体系与产业行业结构转型下的职业学校建设。高职学校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占半壁江山，继普通本科院校实施“双一流”战略后，2019年4月国家《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双高计划”）明确指出：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职学校和专业群，带动职业教育持续深化改革，强化内涵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上述政策明确了高水平学校建设和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是引领新时代职业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和核心切入口。在全面推进“双高计划”的关键期，明晰高水平专业群的内涵，厘清高水平专业群与高水平学校之间的关系，准确把握“双高计划”学校建设应遵循的逻辑及“双高计划”学校建设实践路径，已成为加快推进“双高计划”及其评估进程的关键。

一、“双高计划”学校建设的内涵

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深入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日臻完善，高等学校发展的自主意识与愿望不断增强，“双高计划”是上述背景下高职领域的“规划发展”。与以往政府选择式建设政策不同，“双高计划”标志着高校发展由“政府选择性模式”向“竞争性发展模式”转变，这一转变具体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一）高水平学校以高水平专业群为依托打造学校办学特色

“双高计划”既是“身份”又是“建设”，但更强调“建设”。“双高计划”建设过程中，厘清高水平学校和高水平专业群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从学理上讲，高水平专业群是推动大学不断创新进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

力与内在源泉，正如一流大学的成功之于一流学科的支撑，高水平学校建设只有在聚焦高水平专业群的基础上，才能不断获取滋养，激发办学活力。与因知识分类与科研发展要求而广泛存在于大学中的“学科”概念不同，专业群作为高职学校知识发展逻辑与社会需要逻辑互动博弈的产物，往往表现为围绕某行业或产业设置而形成的一类或一组专业。专业群内各专业具有相同或相近学科或技术基础，同时依托某一学科基础较强的专业逐步发展形成一类专业，是学校长期办学的必然结果。

本质上讲，高职学校专业群与本科学校学科相比，其对社会指向性与适配性更紧密，其变化充满弹性，是由职业教育与行业企业背景关联度高、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密切性强的特点确定的。一所学校存在数量不同的多个专业群，专业群不仅承载着师资、课程、基地、设施等教育教学资源，同时能通过资源优化整合、共享和互补，提高总体办学效益。专业群建设存在于高职学校生命体，在与行业产业衔接过程中，与区域经济发展互动过程中，通过拓展自身发展的多样性，不断优化做强特色优势专业群，在互利共赢交往中凸显学校办学特色。

（二）高水平专业群通过示范作用带动其他专业群发展

理论上讲，只有多个专业群拥有绝对竞争优势和实力的学校才能称为真正的高水平学校。由于学校竞争性发展需求与教育资源有限供给之间存在矛盾，学校专业群建设并非遵循整齐划一的理想型节奏发展，这决定了每所学校专业群布局规划存在“重点差异”与“差序发展”格局。因此，择优重点建设将是学校专业群未来建设与整体水准提升的必由之路，高水平专业群形成正是这一理念视阈的现实观照。通常来讲，高水平专业群从初创设立到建制完备、从薄弱走向成熟，

符合循序渐进发展道路，涵盖数个专业的课程教学、师资支持、教学管理、平台建设等要素作为支撑保障。专业群作为伴随专业成长日益成熟的专业集合体，不仅包括专业的知识形态与资源配置，同时暗含了作为“专业间性”的系统关系。正如哈维·弗格森（Harvie Ferguson）所言，“随着社会学对主体间现实的直接探索越来越深入，两个学科之间的牵涉也越来越深。”受诸专业关联性与耦合程度的规约，专业间诸要素的协同配合与共意表达愈加默契，规范化与标准化程度就愈高，相应专业群建设水平就愈高。随着专业群发展成熟度的提高，原有专业基础上的专业发展路径逐渐形成，专业发展路径作为大学学术场域内嵌于专业组织与制度中的隐性行动方案，将对其他领域专业群成长起指引与示范作用，形塑并带动更多高水平专业群产生。

（三）高水平学校和专业群共同发力彰显职教之道

“双高计划”将高水平学校和高水平专业群置于未来建设核心地位，反映高水平学校和高水平专业群共同参与职业教育内涵建设，实现院校高质量发展的价值旨归。与本科院校“双一流”建设政策不同，“双高计划”高水平学校建设和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更多代表发展程度与发展阶段方面的差异，而非院校总体建设目标与发展定位方面的差异，因此可视为“同素异形”发展。从宏观层面看，全国1400余所高职院校基本属于专业特色型院校，其目标定位与生俱来兼具较强的行业产业属性与区域经济发展属性，很大程度上围绕学校特色建设高水平专业群本身就是建设高水平学校。同时，无论“双高计划”提出的高水平学校还是高水平专业群，根本都着眼于专业群建设，也体现出专业群在“双高计划”建设中的核心与基础地位，可以说，我国高水平学校建设很大程度取决于专业群建设的质量与水准。随着区域产业集群越来越受到关注，高职学校作为知识生产与布局的重要机构，理应成为地方产业集群的重要构成部分，与之而来的是专业群作为提高竞争力的模式引起学校普遍关注。高水平学校和高水平专业群依据“产业链—职业群—专业群”逻辑表达建设愿景开展实践探索，共同助力新时代职业教育特色高质量发展，彰显职教之道。

新时代内涵。

二、“双高计划”学校建设的推进逻辑

“双高计划”学校建设体现的意蕴内涵与时代特点，为职业教育促进产业升级、服务区域发展、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作为“后示范”时期“双高计划”学校建设，并不是院校发展的择优支持，而是给予新政策供给，明确高职学校群体发展方向，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推动高职学校改革。“双高计划”学校建设推进逻辑主要包含三个方面。

（一）从“技能型”迈向“技能复合型”的人才培养逻辑

高职学校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产物，自始至终专注为社会培养亟需技术技能型人才。随着科学技术更新迭代速度加快，经济发展模式升级以及生产方式由技术密集型向高技术密集型过渡，职业与产业劳动力市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无论从新兴职业产生种类来看，还是从职业岗位产生背景来看，不难发现新技术革命对劳动者能力要求已不再是单一技术技能需求，而是包含多种能力共同构成的职业核心素养。正如迈克尔·吉本斯（Michael Gibbons）所言，“现代大众高等教育教导人们不要过度专注于一种职业或是仅掌握一套技术，它使人们做好了应对二者变化的准备，即他们必须快速地转变。”高职学校原有“技能型”人才培养逻辑过度关注作为“工具人”的岗位技能培养，忽视了作为技能可迁移性基础的职业核心素养培育，最终导致学校培养人才的技能储备、职业发展与现实需要存在难以弥合的差距。为扭转高职人才培养与社会职业需求之间存在的供求错位与不匹配现象，“双高计划”旨在明确人才培养定位，摒弃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工具主义倾向，其倡导的“技能复合型”人才培养逻辑强调培养的人不仅在某方面拥有出类拔萃的能力，同时在各方面都具备较高的技能与能力。“技能复合型”人才作为一种多功能性人才，将成为未来行业企业真正具备可持续发展潜力的“职业人”。

（二）从“校企合作”迈向“校行企合作”的社会服务逻辑

“双高计划”明确提出，创新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融合发展运行模式，提升高职学校服务产

业转型升级能力，推动高职学校和行业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真正实现产教融合。从已有经验看，校企合作作为增进学校资源与企业资源沟通、形塑二者价值共识的有效手段，能够较好实现产业与教育的融合，缩短学校与企业合作的距离。然而，现实我国校企合作中存在较严重的“壁炉效应”，即学校一方积极主动寻求与企业合作，而企业方表现比较被动，与学校合作的主动性欠缺。事实上，在学校和企业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个“中间地带”，这是社会分工不同而自然引发的空白地带，它既不归属于学校也不归属于企业。对高校或企业任何主体而言，仅凭自身调整与改变都存在诸多可操作性难题。发达国家经验显示，行业协会作为专业性协调力量尽管没有政府政策导向那么显著，但始终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行业协会通过代言学校与企业权益，增进彼此合作互信，为企业界与学术界搭建起了无形的沟通桥梁。可以说，行业协会在学校与企业间较好发挥了中介作用，是二者深度合作的“粘合剂”。行业协会通过助力高校与企业形成“学校—行业—企业”为轴心的组织共同体，加深高职学校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内在逻辑联系，从根本上带动产业转型升级。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曾言，“结合了的共同意志可以设想为一种统一的意志，它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实现这种意志，只要统一的意志被理解为主体，统一意志就必须设想为一个统一体。”行业协会的介入打破了传统校企合作非对称性资源依赖，通过协商性交换共赢，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最终实现校企合作差异互补性与利益整体性。为此，“校行企合作”利益格局将成为未来我国“双高计划”学校变革的路向。

（三）从“管理”迈向“治理”的院校发展逻辑

高职学校作为培养应用型专门技术人才的核心场域，注重理论性与应用性统一，其自身具有较广阔的开放性、跨界性与互动性特征。“双高计划”明确指出，提升学校治理水平，健全内部治理体系，设立学术委员会、专业建设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发展跨学科专业教学组织，反映出高职院校发展逻辑正从传统“管理”范式向“治理”范式推进。与以行政手段作为推动学校

发展的法定型手段不同，新时期高职学校发展逻辑更注重自组织网络式治理，意味着解决事情的能力并不限于行政组织，而是建立在信任与互利基础上的社会协调网络。具体而言，“管理”与“治理”在行为路向上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其一，权威的来源不同。“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未必源于法定组织及其职权赋予，“治理”的权威是基于平等对话、自愿协商、合作共赢释放的善态能量，形塑多元主体间责任与义务交往关系。其二，实施过程中，权力运行向度不同。“管理”遵循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向度，通过施令、政策对公共事务进行单一向度管控。“治理”是平行互动过程，通过确立共同价值认同与理念目标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相互的。总之，高职学校未来发展旨在通过优化内部治理结构，打造多元共生基层治理组织、全面搭建维系学校内部良好运转的权力依赖，从而形成充满活力的利益共同体，助力高职学校更高质量发展。

三、“双高计划”学校建设的实践路径

“双高计划”学校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在明确学校建设推进逻辑基础上统筹规划、整体考量。为引领新时代职业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双高计划”学校建设需要在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打造、高水平双师队伍构建三个方面有所作为（如图1）。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是“双高计划”学校建设的核心依托，以技术人才培养与技术创新转化为主体的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是“双高计划”学校建设的内在支撑，高水平双师队伍建设是“双高计划”学校建设的外在保障。

（一）聚焦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实现专业建设联动

打造高水平专业群不仅是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的核心，同时也是职业教育的关键环节。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与学校改革发展与目标定位密切关联，直接关系学校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的方向性与有效性。从实践层面看，高水平专业群并非高职专业建设的“升级版”，也非原有高职专业基础上简单排列组合，而是在对接产业链需求与岗位群需求基础上专业建设的体系重构与专业间的有机融合。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有助于将产业需求

侧的新方法、新工艺、新技术等产业先进要素纳入专业教育教学内容，重塑专业组成结构与利益格局，实现专业建设的联动。专业建设联动是学科秩序与知识逻辑整合的映射，在推动高水平专业群建设过程中，要形成更加清晰的“专业格局”，充分尊重各专业要素间的地位及作用。

高水平专业群不仅是大学内部专业整合的状态，也是专业资源和知识整合的机制。高水平专业群建设要从以下三方面入手：首先，动态调整专业构成。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是伴随产业发展持续优化升级的动态过程，建设过程中，应灵活调整专业构成和专业方向，拓展相关或相近专业，在专业群主体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增强外部市场的适切性，始终保持专业群具有旺盛活力；其次，提升专业建设空间场域。将专业建设空间场域由学院内部上升至不同学院之间，拓展专业建设活动范围，有助于打破传统专业“分门别类”专业界限，释放专业组合的能量；再次，增强专业协同创新能力。专业协同创新能力的增强要以产业发展重大需求为导向，以专业群协为基础，通过政、校、行、企多方深度融合，围绕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两条主线，打造技术技能积累高地，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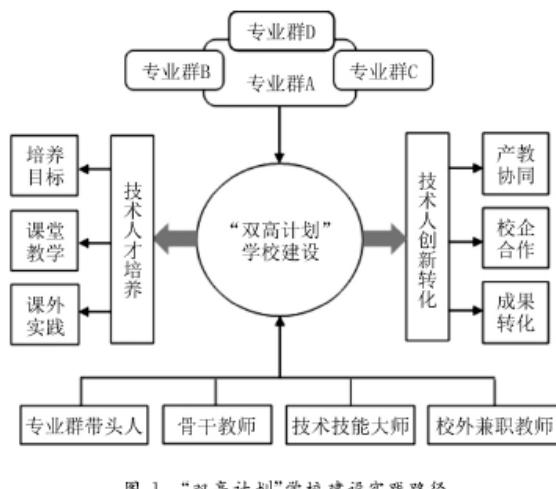


图1 “双高计划”学校建设实践路径

(二) 打造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促进创新成果产业化。

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指以人才培养、资源共享、技术服务为核心，集技术技能积累与创新转化为一体的技术服务平台。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依据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紧密对接现代产业体系，努力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技术技

能创新、产品研发与社会服务，力图使“双高计划”学校成为区域科技创新服务的策源地和集聚地。具体而言，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主要包括技术人才培养平台与技术创新转化平台两方面。

就技术人才培养而言，高职院校要重点关注培养目标、课堂教学、课外实践三方面：首先，培养目标方面，高职学校应统筹考虑社会“技能复合型”人才现实需求，立足自身办学层次和办学定位，结合区域行业产业特点，精准把握、优化调整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其次，课堂教学方面，高职学校要在整合专业群共同知识、技能、素质基础上，创设模块化课程，探索可拓展、多样化、面向岗位群的课程建设新模式。模块化课程对接职业标准，按不同职业方向分流培养，有助于使课程体系实时保持与产业界信息交流、资源共享，帮助学生形成岗位核心能力；再次，课外实践方面，高职学校可通过高技能人才培训、员工职业生涯成长等实践活动，提升人才素养结构，实现人才结构合理优化。

就技术创新转化而言，高职院校深化产教融合，有助于加强教育与产业耦合发展中人才链与创新链有机衔接，加速创新成果与核心技术产业化，其中包括：一是实现产教协同。高职学校应深化与企业、产业园区及行业协会合作，建设集人才培养与应用、研究咨询与开发、技术推广与服务等功能为一体的产教协同育人平台，努力服务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二是优化校企合作。高职学校要强化应用导向，依托企业优势，使学校教育功能与企业生产经营功能有效结合，实现技术创新成果由“课堂”走向“市场”；三是提升成果转化。高职学校应实现教学内容与技术进步同步更新，在技术研发中提升师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将创新实践成果转化成为解决生产生活实际问题的产品与服务，提升服务行业企业能力。

(三) 构建高水平双师队伍，保障人才培养专业化。

高水平双师队伍不仅是“双高计划”学校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同时也是高职学校教师队伍的核心组成。高水平双师队伍内涵主要包括两方面：职业资格方面，高水平双师队伍指既要具备高等教育法律规定的教师资格，又要具备一定的

(下转第32页)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项目分析

郭福春 许嘉扬 王玉龙

从2006年的“示范校计划”到2019年的“双高计划”，高等职业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驱动下开始成为一种“教育类型”。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是后示范时期高职教育改革的新导向，是高职学校内涵提升和创新发展的新启程。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新时代背景下，以创新驱动为主要特征的区域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倒逼职业教育改革，迫切需要构建更加有效的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机制。“双高计划”作为一种制度性设计，赋予职业教育全新的时代内涵，为高职学校持续深化改革指明方向，引领高职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基于这种认识，本研究在“双高计划”启动之际，采用数据统计分析方法，以“区域分布（出发点）—产业布局（结合点）—绩效评价（支撑点）—人才培养（落脚点）”为逻辑主线，从不同维度对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群建设项目进行系统梳理与剖析，对于高职学校回应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诉求，谋划改革发展新路径、优化教育教学资源配置、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参考价值。

一、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项目源起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项目是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社会外部力量和教育内部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社会外部力量讲，科学技术迅猛发展。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不断深入，产业转型升级加快，需要高职学校在高质量发展基础上培养产业急需、技艺精湛的技术技能人才。从教育内部力量讲，高等教育结构不断优化。截至2018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48.1%，高职学校在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向普及化阶段迈进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需要职业教育由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发展。与此同时，职业教育类型特色不断彰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快速发展，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尤其在经过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和优质

校建设后，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优化学校、专业布局，需要推出具有引领改革、服务发展的具体举措。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作为国家深化职业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做出了一系列决策部署，明确了任务要求，指出到2022年，要“建设50所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50个骨干专业（群）”。为进一步落实要求，教育部、财政部印发《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以下简称《“双高计划”意见》），明确建设目标和改革任务，强调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支柱产业，建设当地离不开、业内都认同、国际可交流的高水平学校和专业群，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和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发挥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群的龙头作用，引领带动职业教育培养数以千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作为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双高计划”的使命担当和价值追求在于扎根中国大地，形成支撑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制度、标准体系，探索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引领职业教育有效服务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从2018年初教育部提出“启动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到2019年先后印发《“双高计划”意见》《项目遴选管理办法（试行）》《项目申报通知》，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体现了项目遴选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一是明确申报学校基本条件。项目遴选坚持质量为先、改革导向、扶优扶强，在基本条件中明确了学校设置标准、工作成效、标志性成果等条件，强调基础、注重成效。二是明确申报流程。本次项目遴选有学校申报、省级推荐、遴选确定等环节，分别对学校和专业群评价赋分，将建设基础和实施方案综合评定，其中省级推荐和遴选确定均有公示环节，确保遴选过程合法合规，接受社会监督。三是明确项目分类分档。“双高计划”分为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群两个类别，其中专业群的遴选是国家层面的首次，同时两个类

别又分为A、B、C三档。

二、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项目建设基本情况分析

(一) “双高计划”建设项目类型分析

根据工作申报通知要求，各省级行政部门于2019年5月31日完成省级推荐工作，教育部、财政部于2019年10月25日正式公示。全国32个推荐单位（含兵团）向教育部、财政部推荐“双高计划”建设单位230个，经项目建设咨询专家委员会推荐，教育部、财政部审定，最终立项197个。其中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56个，A档10个、B档20个、C档26个；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141个，A档26个、B档59个、C档56个。

《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有高职院校1418所，根据教育部等部门的认定情况看，国家示范高职院校100所、骨干高职院校100所。统计发现，入选“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名单中，145所为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52所为其他院校。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100%为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其中国家示范高职院校42所，占比75%；国家骨干高职院校14所，占比25%。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中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89所，占比63.12%，其中示范校34所，占比24.11%，骨干校55所，占比39.01%。从A档、B档到C档，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中非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的占比依次增加。

进一步从学校所属类型来看，“双高计划”建设单位中，理工类高职院校的优势明显，占比超过50%。（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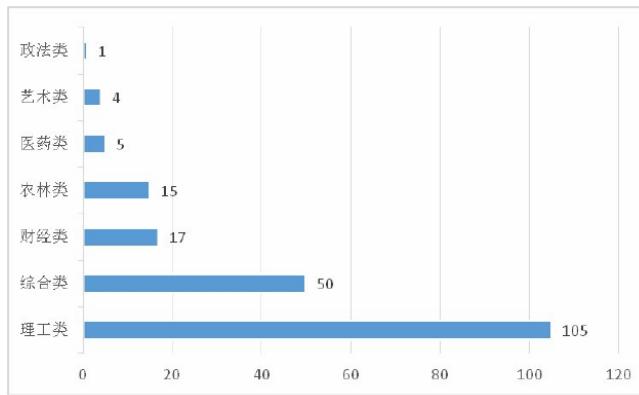


图1 “双高计划”建设单位类型图

(二) “双高计划”建设单位的区域分布

从“双高计划”建设单位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来看，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数分布为：江苏7个，浙江6个，广东5个，山东、陕西各4个，北京、天津各3个，重庆、湖南各2个，河

北、四川、湖北、河南、辽宁、黑龙江、安徽、福建、吉林、广西、甘肃、云南、宁夏、江西、山西、贵州、内蒙古、海南、上海、新疆等20个省各1个，青海和西藏等各省区为0个。其中江苏、浙江、广东、山东、陕西、北京、天津7省共32个，超过总数一半以上，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陕西在中西部为一枝独秀。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数分布为：江苏13个，山东11个，浙江、广东、湖南、河北各9个，重庆8个，四川、湖北各7个，江西、河南、辽宁、黑龙江各5个，陕西、北京、天津、安徽、福建各4个，山西、吉林、广西各3个，贵州、内蒙古、甘肃、云南各2个，宁夏、新疆各1个，海南、上海、青海、西藏各0个。从省级区域层面来看，

“双高计划”建设单位数量的整体趋势是从经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逐渐减少。

从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区域的统计来看，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数分布为：东部33个、中部9个、西部14个，其中东部占总数的58.93%，超过中西部之和；在A档中，东部8个、中西部各1个，在B档中，东部16个、中部1个、西部3个，在A、B档中，东部高职院校占80%，占据绝对优势；在C档中，东部9个、中部7个、西部10个。在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中，东部68个、中部41个、西部32个，分别占总数的48.23%、29.08%、22.69%，与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相比，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的区域分布更均衡。



图2 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群建设单位数量的区域排位图

由此可见，“双高计划”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关。在经济越发达的东部地区，“双高计划”建设学校的数量占比越大，建设质量水平（A档占比）越高。作为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高职教育的生命力主要表现在对区域经济的主动服务性与动态适应性，而提供智力支持和创新活力的“双高计划”建设学校俨然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保障要素。

(三)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专业群的产业布点

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是产业转型升级、专业社会服务能力提升、教学资源合理配置和学校专业布局优化的现实要求。统计发现，在56所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涉及的112个专业群中，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群有5个布点，机电一体化技术、模具设计与制造2个专业群各有4个布点，物联网应用技术、软件技术、畜牧兽医3个专业群各有3个布点，船舶工程技术、道路桥梁工程技术、产品艺术设计、电气自动化技术、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数控技术、通信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信息安全与管理、市场营销、电子商务、护理、会计、老年服务与管理15个专业群各有2个布点，其他60个专业群各1个布点。

112个专业群按照“双高计划”的要求，主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支柱产业。其中，35个专业群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占31.25%；31个专业群面向先进制造业，占27.68%；31个专业群面向现代服务业，占27.68%；9个专业群面向现代农业，占8.04%；6个专业群面向其他产业，占5.36%。

通过分析发现，高水平高职学校专业群的设置、布点与产业发展紧密契合。专业群主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支柱产业，随着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这三大产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量剧烈增加，契合产业发展的专业群布点数也相应扩增。专业群建设是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的主要内容和关键所在，是提高教育供给质量、增加核心竞争力的重大制度设计。为了适应新技术引发的快速职业迭代，高水平高职学校应该基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四新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实际诉求，以专业群为单位，发挥集聚效应和服务功能，通过有效对接需求、有序调整变动、有力协调发展，优化专业结构，以专业对接产业布局、以产业推动专业设置，彰显职业教育类型特色。

三、各地区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群建设绩效评价

自2006年以来，国家先后立项建设“示范校”“骨干校”“双高计划”，引领推动各地区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群建设；各地区非常重视立项建设，纷纷加大经费投入，高职学校通过加强管理、深化改革，提高自身声誉及办学水平。

虽然“双高计划”刚刚启动，但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群建设离不开中央和地方财政资金的先期支持。为考察各地区先期财政经费投入效率，本研究采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进行绩效评价。DEA法是一种可用于多项投入和多项产出的效率评估方法，变量不需要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用综合指标评价效率。考虑到指标体系的代表性、可测性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选用各地区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的数量占比和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的数量占比作为产出指标，高职高专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省级财政投入经费和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作为投入指标，运用DEAP2.1软件对我国31个省级地区的数据进行有效性测算。具体测算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各地区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群建设的DEA测算结果

地区	综合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规模报酬	地区	综合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规模报酬
江苏	1.00	1.00	1.00	不变	安徽	0.39	0.79	0.49	递增
浙江	1.00	1.00	1.00	不变	吉林	0.71	1.00	0.71	递增
山东	1.00	1.00	1.00	不变	山西	0.46	1.00	0.46	递增
广东	0.81	0.81	0.99	递增	重庆	1.00	1.00	1.00	不变
河北	1.00	1.00	1.00	不变	陕西	1.00	1.00	1.00	不变
天津	1.00	1.00	1.00	不变	四川	0.99	1.00	0.99	递减
北京	0.65	0.65	0.99	递增	广西	0.38	0.83	0.45	递增
辽宁	0.59	0.87	0.67	递增	甘肃	0.31	0.61	0.51	递增
福建	0.47	0.78	0.60	递增	云南	0.78	1.00	0.78	递增
海南	1.00	1.00	1.00	不变	贵州	0.33	0.87	0.38	递增
上海	0.52	0.55	0.94	递增	内蒙古	0.29	0.65	0.44	递增
湖南	1.00	1.00	1.00	不变	新疆	0.94	1.00	0.94	递增
湖北	0.68	0.83	0.82	递增	宁夏	0.96	1.00	0.96	递增
河南	0.44	0.90	0.49	递增	青海	0.00	0.83	0.00	递增
江西	1.00	1.00	1.00	不变	西藏	0.00	1.00	0.00	递增
黑龙江	0.77	1.00	0.77	递增	全国	0.69	0.90	0.75	递增

注：1. 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2. 综合效率值在0到1之间，越接近于1，越接近于整体效率有效；3. 各地区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群建设单位数量通过教育部、财政部公布的《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群建设单位名单》整理而得，各地区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和高职高专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各地区省级财政经费投入数据来源于《关于〈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执行情况及有关工作完成情况的通报》。

综合效率是对高职学校财政资金利用效率和配置能力的综合评价，纯技术效率体现高职学校在办学质量和管理水平等方面的差异，规模效率表示高职学校在既定办学管理水平条件下现实规模与最优规模之间的差距。综合效率值等于1表明DEA相对有效，这时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群建设的投入和产出实现相对平衡和相对最优；纯技术效率等于1表明办学管理水平是有效的，应该优化财政投入规模；规模效率等于1表明财政投入规模是最优的，应该提高办学管理水平。测算结果显示，全国31个省份的平均综合效率为0.69，说明

我国先期财政经费投入的整体效率并不高，仅达到最优效率的69%。从东部、中部到西部地区，平均综合效率依次递减，分别为0.82、0.68和0.58。

江苏、浙江、山东、河北、天津、海南、湖南、江西、重庆、陕西等10个省级地区的综合效率为1，达到最优效率。黑龙江、吉林、山西、云南、新疆、宁夏、西藏等7个省级地区纯技术效率有效，规模效率无效但规模报酬递增，这些地区如果要达到综合效率有效，可以增加财政投入规模，从而发挥规模效益。四川地区虽然纯技术效率有效，但规模效率无效并且规模报酬递减，因此在既定财政投入水平下需要提高当地高职学校的办学效率和建设质量。广东、北京、辽宁、福建、上海、湖北、河南、安徽、广西、甘肃、贵州、内蒙古、青海等13个省级地区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无效，但规模报酬递增，说明可以适度扩大财政投入规模，但同时也要提当地高职学校的建设水平。（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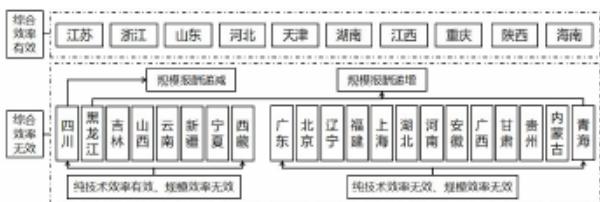


图3 不同地区先期财政经费投入效率的类型分析图

综上所述，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群建设的财政经费投入效率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目前我国先期财政经费投入的整体效率并不高；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财政经费投入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财政经费投入效率未达到最优状态，但是规模报酬递增，需要进一步加强财政经费支持力度。鉴于此，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群建设的财政经费投入应该因地制宜，适度向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倾斜；同时，各地区应该依据绩效评估结果，建立“双高计划”建设的动态拨款机制。

四、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分析

（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高职学校扎根中国大地，结合行业背景、发展实际和专业特色，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工程，自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教书育人的各方面、各环节。“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围绕思政教育、传统文化、通

识教育、校园精神、专业文化、劳动教育、职业生涯成长等内容，设计工程、实施计划、推进项目等育人载体，构建系统的职业素养养成体系，培养学生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值得关注的是，“双高计划”建设单位特别重视劳动教育和工匠精神。（见图4）多所“双高计划”建设学校成立学校劳动教育研究中心，通过优化顶岗实习、实习实训、技能训练、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等形式强化劳动教育，促进学生知行合一，帮助学生在做中学、学中做，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让学生感受劳动实践的魅力；因地制宜开展劳动教育，通过劳动教育促进学生工匠精神养成，实现职业技能与职业精神培养高度融合，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全力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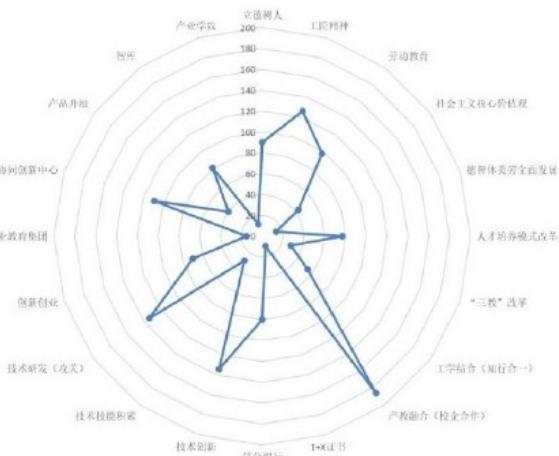


图4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核心要素的词频图

（二）强力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和核心要素，也是“双高计划”建设的基本原则。“双高计划”建设单位主动对接区域产业发展需求，聚焦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强调与行业领先企业深度合作，主动参与专业领域供需对接和流程再造，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适应，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深入融合。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词频率最高，达到186次）作为“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制定实施方案的工作主线，在文本中有着较多反映，强调畅通学校与政府、行业、企业交流渠道，组建产业联盟，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校企共建产业学院、企业工作室、实验室、技术研发基地等产教融合平台，加强与地方政府、产业园区的深度合作，将人才培养延伸至技术研发、产品升级、员工培训、资源共享等方面；发挥行业协调指导的作用，拓宽

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途径，专业建设对接产业发展，强调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学徒制等的创新实践，强化企业主体作用，打造“教学工厂”和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深化行业企业全方位参与人才培养，提升校企合作水平。“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坚持校企双元办学主体，充分挖掘产教融合的深度，从实体化运作、产学研创一体化等探索产教融合的新路径、新方法，健全校企协同育人长效机制，通过专业群建设实现要素的全方位融合，铸就校企命运共同体，形成产教深度融合的中国范式。

（三）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高职学校建设的中心工作，是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的起点和归宿。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为主的新一轮技术变革和产业革命，导致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结构与培养规格发生根本性变化。在传统产业与企业岗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才培养体系不再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新需求。新职教背景下，“双高计划”建设单位注重推进“三教”改革，健全德技并修、工学结合育人机制，依托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项目，建设内容强调校企共同研究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及时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纳入教学标准和教学内容；完善职业教育集团、产教融合型企业等组织在人才培养中的价值，发挥产业学院、协同创新中心等载体在校企合作中的作用；利用现代学徒制、1+X证书制度试点等项目深化人才培养改革，组建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探索教师分工协作的模块化课程，对接区域人才需求，服务产业转型升级。在改革任务中，“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对接多样化生源，因材施教，推进学生学业综合评价改革，建立校级学分银行，健全学分积累及转换制度，其中学分银行（词频率为80次）成为各建设单位推进人才培养改革的重要抓手；对接岗位职业技能要求，打造高水平专业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建设模块化课程，注重学用相长、知行合一，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增强学生的职业适应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培养产业急需、技艺精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四）打造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

“双高计划”建设单位注重对接科技发展趋势和行业企业发展，特别是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学校专业优势，在方案制定过程中，重点强调学校在技术技能积累和创新方面的

作用；通过建设协同创新中心（词频率为109次）、技术成果转化中心、研究院所、创新创业基地、产教融合平台等运行载体，依托院士、各类学者、行业企业领军人才等高层次人才组建科技创新团队，与行业企业开展项目合作、师资共享、学生交流等，主动参与供需对接和流程再造，打通政产学研用合作通道，促进高职院校与行业企业深度合作，引进资源，实现优势互补，构建产教融合型技术创新服务体系；打造由政府专家、行业专家、跨专业教师和学生组成的智库咨询与技术服务团队，通过项目任务载体，不断提升研发团队的创新能力，联合行业领先企业协同开展技术攻关与横向合作；以技术技能积累和创新为纽带，合作开展科技攻关及产学研活动，促进高职院校技术技能积累和社会服务能力提升，组织开展校际科研与社会服务项目合作，打造集人才培养、技术创新、智库咨询、产品研发、创新创业等于一体的高水平技术创新服务平台。

（五）加强体制机制改革

引领改革是“双高计划”的重要建设内容，“双高计划”建设单位注重从体制机制上破解院校服务企业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问题。“双高计划”建设单位通过校企双方共建产业学院，完善校企合作机制体制，建立协同创新、人才聘用、资源配置、考核评价等方面优惠政策，促进创新资源和要素的快速汇聚，明确政产学研用在校、院两级的管理网络、任务分工、工作目标，先后在人才培养、团队建设、人事分配、后勤管理等方面进行修订或增补协同创新管理制度；强调建设校企共建产业学院、研发中心等具有混合所有制属性的组织，突破校企合作中存在的瓶颈，注重以技术技能积累为着力点，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主线，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强化科技合作与交流、提高科技支撑能力和构建社会服务窗口为重点，以市场导向，坚持政校行企等多方以资本、技术、设备、场地、人力等要素投入，共享建设成果，共担运行风险，构建校企协同育人长效机制。

（郭福春，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副校长、教授，浙江杭州 310018；许嘉扬，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信息与互联网金融学院助理研究员，浙江杭州 310018；王玉龙，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教务处助理研究员，浙江杭州 310018）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1期）

“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路径

李梦卿 邢 晓

专业建设是高职院校内涵发展的重要内容与核心任务。2019年3月，教育部、财政部发布《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要“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职学校和专业群”，并于同年12月公布了56所高职学校为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141所高职学校为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面对新的社会背景和政策环境以及日趋激烈的发展竞争，高职院校亟须从专业人才培养、专业课程及教学体系、专业师资团队以及相关体制机制等核心要素出发，探寻打造高水平、特色优质专业的建设路径，以适应区域产业发展新需求、行业企业岗位新变化，切实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内涵与质量，推动高职院校与区域产业协调融合发展。

一、以区域产业发展为导向，明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是“双高计划”的重要任务之一。新时代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产业集群化发展对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影响，首先集中反映在高职院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变化上。高职院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确立须以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对经济社会和人才需求的影响为导向，考虑专业人才的类型层次、职业素养以及专业能力，以期达到如《意见》所要求的“精准对接区域人才需求，为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供有力支撑”的目标。

1. 对接产业结构，实施分层分类培养。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传统产业转型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2019年三次产业经济增长贡献率分别为3.8%、36.8%和59.4%，第三产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拉动作用日益突出，新动能、新产业以及相关产业的持续发展也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面对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技术引领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对

各领域人才的迫切需求，加快高职院校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质量培养与有效供给是高职教育适应产业经济发展新形势的重要前提。区域产业和职业教育的协同发展离不开产业结构与专业人才的有机衔接，专业建设作为联结专业人才与产业需求的重要纽带，是衡量高职院校专业结构适应经济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尺度。随着产业集群动态演变以及新兴产业衍生重组，劳动分工细化，职业岗位增多，人才需求结构日益复杂，人才专业化要求更高，高职院校专业人才的培养亟须紧跟产业结构调整步伐而发生改变，以适应产业新知识、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发展变化，实现生产要素的改进和产业结构的优化。

美国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认为，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其办学类型、人才培养等必然逐渐分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8年联合印发的《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提出，要健全科学的人才分类评价体系。合理的专业人才结构是推动产业优化升级的不竭动力，实施专业人才分层分类培养是高职院校强化产业链与产业链有机衔接的必然途径。教育部自2016年以来持续发布高职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专业，其中2016年有13个、2017年有6个、2018年有3个、2019年有9个，高职院校要紧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新业态，通过对产业发展周期的把控和预测及时调整专业建设的方向和规模，培养社会发展所需的各类专业人才。2014年，国务院在《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将高职教育的层次结构划分为专科层次、本科层次和研究生层次，高职院校要立足时代特征和现实需求构建“高职（专科层次）——应用型本科——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培养体系，不断丰富职业教育学历学位层次，提升专业人才发展空间，以满足区域产业战略发展的需要。

2. 厚植职业素养，注重德技并修。职业素养是个体在从业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综合职业素质，

不仅包括从业所需的知识与技能，同时也包括从业过程当中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品质与态度行为，这也是我国职业教育先驱黄炎培先生始终倡导的“敬业乐群”“赤诚爱国”“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等教育思想之精髓，是高职院校专业人才培养的首要目标，是企业选用人才的第一标准。高职教育肩负着为社会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使命，厚植学生职业素养是新时代高职院校专业人才培养的第一要务，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工匠精神”的核心理念、“德艺双馨”的价值追求有着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不同专业需具备不同的知识架构、综合素养、实践技能，高职院校要以学生的职业素养教育为核心，明确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建立健全的人才培养方案和实施体系，将知识、能力、素养融为一体，充分体现高职院校对学生职业道德、职业知识、职业技能、职业信念的重视程度，适应企业的实际需求，满足学生的发展需要。

2019年6月教育部发布的《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确立要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明确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双高计划”也强调要注重培育和传承工匠精神，着力培养一批产业急需、技艺高超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工匠精神”不仅是一种职业精神，代表着崇高的道德品质，同时也被人社部颁发的《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技术规程（2018年版）》纳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是职业知识与专业技能的集中体现。高职院校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德艺双馨的人才观、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融入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中，将职业道德的培养融入职业知识和职业技能教育中，培养高职院校学生良好的职业信念和态度，通过“育德”以塑造学生崇高的职业道德、“储知”以夯实学生丰富的职业知识、“修技”以培养学生精湛的职业技能、“涵情”以孕育学生坚定的职业信念，注重德技并修，健全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促进高职院校学生全面发展。

3. 强化专业特色，服务地方产业经济。专业建设是社会需求与学科建设的体现和延伸，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形成专业特色与优势的过程，

特色专业是高职院校办学水平与社会影响力的集中体现，是高职院校内涵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然而，目前我国高职教育培养的专业特色人才还是难于满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部分高职院校在培养方案设计和培养过程中同质化态势日趋明显，缺乏核心竞争力。为此，作为专业特色人才的培育基地，高职院校亟须在长期办学过程中探索并构建符合本校实际的、具有专业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形成相对于其他学校同类专业的独自的优势与特色，提升专业竞争能力，以培养学生的发展潜力，服务社会发展的需要。由于受到专业多样性、地域局限性、资源有限性等影响，将所有专业建成高水平专业是不现实的，这就需要高职院校充分考虑自身区域特色、资源优势、产业特征，紧紧围绕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培育特色优势专业，增强学校的竞争力，提高专业的吸引力，提升学生的胜任力。

“把专业建在产业链上、把学校建在开发区里”，已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共识。《辞海》将“专业”定义为“高等学校或中等专业学校根据社会专业分工需要所分成的学业门类”，按照产业发展需求合理布局专业是落实人才培养目标、服务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专业特色要立足区域产业经济，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优势资源为基础，以办学条件为前提，以人才队伍为支撑，优化并完善特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合理确立并设置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尤其是与产业发展趋势相一致的专业，创新并提炼专业特色。同时要形成动态调整机制以提升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和职业岗位需求变化的能力。比如，广西自治区教育厅2015年启动专业退出机制试点，明确提出对连续两年就业率低于70%的专业（除个别特殊专业外）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安徽省教育厅对就业不好、布点过度的专业给予每个专业15万元的专业改造费以促进专业转型发展。这些政策和机制有利于促进和刺激高职院校适时调整专业结构，拓展专业发展新空间。

二、以校企命运共同体为依托，改革专业课程及教学体系

“双高计划”明确提出要提升校企合作水平，

形成校企命运共同体。优质的课程及教学体系是专业建设的重要载体与有力支撑，校企双方在课程改革、教材建设、教学创新等方面深度合作是高职院校专业建设与改革创新的核心与关键。高职院校亟须通过合作与企业共同确立专业及课程结构，共同开发和调整课程内容及教材体系，共同改进和创新教学模式及方法，增强专业建设与社会需求的契合度与适应性，提升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内涵与高职院校的办学水平。

1. 参照职业标准，优化专业及课程结构。在2015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中，职业体系被分为8个大类、75个中类、434个小类、1481个职业和2670个工种，为高职院校专业课程结构的合理设定，为职业教育培训与职业技能鉴定的有序开展，为用人单位的人员筛选和录用提供了权威依据。英国学者鲍勃·曼斯菲尔德认为，职业标准是衡量能力的标准，职业标准是在职业分类的基础上，根据职业的特性、技术工艺、设备材料以及生产方式等要求，对从业人员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提出的综合性水平规定，职业标准是确立专业结构的基础，也是规范课程结构的依据。高职院校专业及课程结构的优化改革需要在校企双方协同合作之下，围绕行业最新职业标准的内容和结构，整合校企双方的优势资源，调整自身的专业结构与课程结构，促进其与职业标准的有效对接，提升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以达到职业标准的要求，确保学生获得胜任该职业岗位所需要的工匠精神、理论知识、实践技能和关键技术。

“一个好的高水平专业，直接取决于高水平的课程，并且还取决于课程的良好结构。”在高职院校课程体系改革中，通过校企合作共同开发和设置凸显人才培养特色课程是专业实现高水平和特色化发展的重要基础。2019年6月教育部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要规范课程设置并将课程分为公共基础课程和专业（技能）课程两类。高职院校要在遵循国家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强化校内专业评估工作，依据职业标准和行业需求，以提高学生综合职业能力为培养目标，合理选择并开设符合区域特征和行业需求的基础素质

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技术课程、综合实践课程、职业生涯设计课程等核心课程板块，不断优化调整以职业标准为载体的课程结构，突出课程的职业针对性和综合实用性，保证课程设置的规范化与特色化，培养符合社会职业标准、满足企业岗位要求的技术技能人才。

2. 针对岗位要求，调整课程内容及教材。以职业岗位要求为核心选择课程内容是衡量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与行业企业实际需求契合度的基本尺度，也是高职院校专业特色和办学内涵的重要体现。“工业4.0”背景下技术的复杂化、尖端化、集约化、融合化发展带来了职业岗位分工精细化和多样化，以及对技术技能人才更高水平的需求，高职院校专业建设需要根据职业岗位的要求科学合理地选择课程内容。根据英国心理学家斯皮尔曼的能力结构理论“GS二因素”学说，能力由一般能力（G因素）和特殊能力（S因素）构成，前者泛指人的可应用于所有实践活动的一般性能力，后者是保证人们完成某种特殊作业或实践性较强的活动所必需的能力。高职院校在选取课程内容时既要关注学生基础素质和理论知识的培养，更要紧密联系生产劳动实际和社会实践，注重专业能力、岗位技能等方面的强化。这就迫切需要熟知职业岗位需求及岗位要求变化的行业企业的积极参与，将行业企业技术标准、岗位要求、工艺规范、工程案例等纳入课程内容，实现课程内容与工作岗位要求的有机融合，提高对外部市场环境的适应能力及竞争水平。

“深化教材与教法改革，推动课堂革命”，是“双高计划”打造高水平专业群的重要内容之一。教育部2019年12月印发的《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提出，要规范和加强职业院校教材管理，教材建设是课程有效实施的必要保证，也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以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1990提出的“钻石模型”理论为基础，结合职教教材特点，可以发现，出版社、职业院校、渠道和行业是职教教材发行和选用的关键要素。面对当前职业院校教材建设中普遍存在的教材选用不规范、内容更新不及时、与企业岗位要求联系不紧密等问题，高职院校亟须以职业岗位需求为导向，充分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

通过外部引用、校企合作开发、自行编写等多种方式，出版和使用具有职业教育特色、适合岗位需求和学生能力的教材。比如，南京旅游职业学院将岗位工作任务、知识技能融入教材开发，按照“调研与论证典型工作岗位——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分析典型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知识的解构与重构——教学内容序化”的逻辑推进学校教材建设，确保教材动态更新、与时俱进。

3. 整合优质资源，创新教学模式及方法。资源共享理论强调主体通过共同分享优质资源以满足各自需要，从而避免资源的重复与浪费，实现目标效率和主体效益最大化。高职院校专业建设过程是政府部门、高职院校、行业企业等主体之间实现政策资源、人力资源、教学资源、信息资源、社会实践资源等资源共享以及制度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环境、技术环境等环境共享的合作博弈过程。优质资源是教学有序实施的基础，目前已有80多个行业组织、3000多家企业通过资源库建设合力调配资源，建设了近1000门标准化课程。高职院校应在此基础上加大与企业的合作，全面汇集并有效整合不同专业、不同科目、不同类型的教育资源。除传统纸质资源建设外，高职院校还需要加强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积累丰富的电子资源、音频影像等媒体资源以及相关学习工具下载包，为各主体获取各种教学资源提供多元化路径，为教学模式改革和教学方法创新提供重要保障。

美国教学设计理论家罗伯特·加涅认为，教学设计主要是规划教学系统的过程，并对资源和程序作出有利于学习的安排。高职院校在专业建设过程中要合理进行教学设计，不断完善教学模式和方法，这既是推动课程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核心，也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保障。高职院校要积极与产教融合型企业开展深入合作，构建开放共享、资源丰富的教学环境，开辟更加广阔的教育活动开展空间，探索更加符合企业真实生产环境、更加适合学生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提升的教学模式，采用项目式教学、案例分析、模拟教学、角色扮演等实践教学方法，将企业的技术标准、行业规范、生产经验、经营环节等引入学校，确保教师不断丰富自身能力结构，提升

专业教学水平，确保学生及时获取专业新知识、新工艺、新技能，提高专业实践能力，确保高职院校与行业企业之间实现优势互补和利益共享。

三、以教学创新团队为支撑，强化专业师资队伍建设

日本学者小原国芳认为，“学校至高无上之宝，实乃优秀教师”，“教育的关键问题是教师”。高水平专业化教师队伍是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重要基础，直接决定了学校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双高计划”明确提出要组建高水平、结构化教师教学创新团队。高职院校要以此为提升教师教学和教研科研能力的着眼点，为高水平专业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1. 强化团队建设，提高教育教学品质。美国学者乔伊斯曾指出，教师专业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和保障学生的成功和发展，若要使教师的发展对学生产生重要影响，专业共同体成员必须集合在一起学习，把所学的知识付诸实践并且分享结果。卓越的、结构化的教学团队提倡教师通过共同工作形成伙伴关系，促进彼此学习，改进教学策略，提升教学质量，在推进专业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高职院校要通过团队建设为教师搭建学习、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一方面，通过示范教学、专题讨论、项目合作、科研活动等方式促进教学成果共享，拓展学术视野，丰富教学资源，改进教学策略，提升教学品质；另一方面，促进各成员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启发、优势互补，为教师个人专业教学水平、科研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的长足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如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小学教育类专业的“多学科教师组合式实践模式”，正是教师教学团队建设的有益探索，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教学水平提升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高水平专业建设需要优质的教师教学创新团队作为支撑，教学创新团队在改进教师教学品质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教学品质是教师在教学行为、能力、作风上所表现的思想、认识、品性等的本质，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高职院校提高教育质量的内在追求。美国学者舒尔曼等人提出，培育教师作为学习共同体的要素包括准备（拥有愿景）、自愿（具有动机）、能力

(知道并能够“去做”)、反思(从实践中学习)和共有(成为专业社群中的一员)。为打造教师学习共同体，促进教学创新团队的形成和教学品质的提升，高职院校需要着重从愿景规划、目标导向、资金支持、协作机制、共享模式等方面加以综合考量，从专业品质、教学水平、专业技能、企业实践经验等方面对教师进行选拔，积极聘请行业企业的能工巧匠和专业人才，提升“双师型”教师的比重，注重兼职教师的作用，打造专兼结合、结构优良、优势互补的师资团队，为创新教学思维、精进教学品质、提升教学成效、促进教师成长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供充足的资源条件。

2. 加强研训结合，提高教研科研水平。随着区块链、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教育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革，丰富的共享资源拓宽了教师观摩学习、培训提升、科学研究的路径。美国著名课程理论专家拉尔夫·泰勒曾指出，“如果要实施全校范围的课程重建计划，就需要让全体教师广泛参与，……否则教育计划无法成为一个促进改革达成目标的有效工具”。而在信息爆炸、知识创生、技术变革的时代，高职院校教师不仅仅在课程改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还被赋予了更多的历史使命和时代重任。20世纪60年代，英国课程理论专家劳伦斯·斯滕豪斯就提出了“教师即研究者”的口号。新时代高职院校教师除了要在专业建设和课程变革中扮演好传授者、引导者、管理者的角色之外，还需要站在研究者和学习者的角度，不断积累自身知识存量，丰富实践经验，提高教研科研能力，提升自我价值。为此，高职院校要加强对教师队伍培养培训的力度，开展多样化的培训和教研科研活动，为教师专业提升和教研科研创造提供良好的环境氛围和平台保障。

群体动力学理论学者库尔特·勒温认为，合作性群体中的个体有较强的工作动机，工作效率会明显高于非合作性群体，英国学者阿尔玛·哈里斯和米歇尔·琼斯等人认为，集体教师的探究与合作可以对学与教产生积极的影响。高职院校要按照学校发展实际组建专业教研小组和科研团队，以推进教学改革、提高教研科研质量为主要

目标，通过专项培训、出国进修、参加学术会议、赴企业实践等集体学习的方式推动教师自身知识结构的更新和专业技能的提升，通过成立大师工作室、校企合作项目研发、课题研究、新技术推广等方式营造良好的研究氛围，促进不同专业、不同科目、不同级别教师之间知识结构、思维方式、技术水平等优势互补，通过将研究与培训相结合推动研训一体化发展。比如，近年来浙江省借力新兴技术陆续推出的网络教研平台、

“天天公开课”及微信公众平台等教研科研载体为全省教研科研信息的发布、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和先行典型经验的推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 优化素质结构，增强社会服务能力。专业是高职院校的关键要素，社会服务也是高职院校的重要职责。“双高计划”提出要提升高职院校服务水平发展水平，引领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区域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教师是社会服务的主要履行者，教师团队良好的素质结构是为社会服务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是落实专业发展目标、提高办学水平的核心要素。1896年美国学者克拉茨采用问卷调查方法研究优秀教师素质，开启了教师专业素质结构研究的先河。美国学者艾伦认为，教师的专业素质结构包括学科知识、行为技能、人格技能，叶澜将其分为专业理念、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结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及职业教育的产业性、职业性、实践性特征，高职院校教师的社会服务能力是其专业素质结构的重要内容和体现，是影响和制约教育教学质量以及教师专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大卫·麦克里兰的素质能力模型将能力分为知识(knowledge)、技能(skill)、自我概念(self-concept)、特质(trait)和动机(motives)。教师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与精湛的技能以满足教学和科研任务的需要，还要强化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通过不断地自我反思、自我更新、自我创造提高自身服务社会的能力，不断拓宽社会服务的领域与途径，将自身所学知识、技能具体应用到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中。高职院校要加强与行业企业、社区组织的联系与合作，大力开展产品研发、继续教育、技能

鉴定、考证服务、企业培训等社会服务活动，为提升高职院校教师服务政府决策咨询能力、职业技能培训能力、社区文化传播能力、技术服务能力等营造良好的氛围和条件，增强专业辐射力和影响力。比如，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的铁道类专业通过开展企业技术创新、经营性实训、送教进厂、设备故障“名医”等服务，实现了“教师成为企业兼职工工程师、学生成为企业准员工、实训车间成为企业车间、企业项目成为教学任务”的转变，促进了专业发展与社会服务的良性互动。

四、以多元协同治理为基础，完善专业建设体制机制

职业教育专业建设涉及要素多元化的特征决定了这一系统化工作过程中各相关治理主体相互融合、协同共进的必然性与必要性。高职院校要协同政府部门、行业企业等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建立专业建设协同治理机制，为专业建设提供基础条件、发展平台以及质量评价等保障，以寻求内外部因素之间的张力平衡，促进专业的稳步辐射与协同创新。

1. 完善经费投入机制，夯实专业建设条件。

充足的专业建设经费是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基本保障。根据2016、2017、2018三年《全国教育经费统计快报》，普通高职高专教育经费总投入逐年上升，分别为1828亿元、2023亿元、2150亿元。“双高计划”提出要“健全多元投入机制”，“各地新增教育经费向职业教育倾斜”。2019年12月，教育部、财政部公布的职业教育“双高计划”建设名单显示，中央财政每年引导资金20余亿元。约翰·布鲁贝克曾在《高等教育哲学》一书中提出，“即使最富裕的国家也不可能提供普及高等教育所需的经费”，教育经费不足始终是高职院校专业建设面临的客观问题。安徽省教育厅厅长李和平在2020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安徽省虽然圆满完成了2019年高职院校扩招任务，但是仍面临着办学条件亟须改善、经费和师资缺口大等问题。高职院校亟须探索专业建设经费多元筹措机制，通过统筹中央高职教育预算拨款、自筹经费、行业企业资助、社会捐赠等多样化渠道提升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专项经费，为建设高水平特色专业提供物质保障。

高职院校职教师资培训、实训基地建设、教学设备采购与更新、项目研发与国际交流等都需要资金的支持。美国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7%以上，在全球处于领先水平，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企业、高等院校、非营利组织以及非联邦政府机构等均参与其中，多元化的经费投入机制为美国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在德国，企业是其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主体，2013年企业投资占德国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72%，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政府和社会为辅助的多元投入机制。我国高职院校要在政府统筹与政策引导下，广泛动员各行业企业的积极参与，获取行业企业的资金支持和项目资助，并利用自身资源和优势为社会提供有偿服务，最大限度地筹集社会资源，增强自我造血功能，加大经费投入倾斜力度，拓宽经费投入渠道，建立政府支持、市场参与、多方筹措的稳定多元的经费投入机制，为高职院校专业建设提供保障。

2. 深化产教融合制度，打造专业实践平台。

美国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认为，产业集聚是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能有效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促进创新。高职院校要聚焦产业集群的现实发展需求，将产业发展的新技术、新材料、新方法以及岗位需求、企业文化等元素融入专业建设当中，发挥优质资源聚集效应，创设与之配套的专业实践基地，以促进产业链与教育链的深度融合与有机衔接。专业实践平台建设不仅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时代需要，也是传承与创新新产品、新方法、新技术和新技能的使命担当。201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对产教融合改革进行了顶层设计，“双高计划”提出要“建设兼具科技攻关、智库咨询、英才培养、创新创业功能，体现学校特色的产教融合平台”。完善产教融合制度是强化各方专业建设主体责任的重要保障，能够有效发挥校企“双主体”育人作用，集中优势资源探索建立不同形态和不同类型的专业实践平台，形成高职院校与行业企业之间深入合作、同频共振的良性生态机制。

2019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要“鼓励职业院校建设或校企共

建一批校内实训基地，提升重点专业建设和校企合作育人水平”。高职院校要充分应用政策导向，积极吸引行业企业优质资源进校园，充分利用学校实验室、实训中心建立校内专业实践平台，将生产环境、合作项目、企业人才引入校园，帮助师生熟悉企业的岗位需求和生产运作过程，为专业实训营造真实的企业氛围，强化师生的学术视野和实践能力。2020年1月，教育部印发的《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管理办法》提出，要加强和规范产学合作协同育人的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项目。为此，需要通过产教融合制度强化企业的主体作用和社会责任，以多种形式支持和激励企业单独建设或联合建设兼具生产与教学功能的校外专业实践基地，落实教师企业实践制度并接受学生参与企业实习，协助企业的生产运作、项目开展与技术研发。例如，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的“学习型”生产性实训基地、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工业中心”、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的校外“实习商场”，均凸显了专业实践平台的共享性、生产性特征，培养了大批高素质专业人才。

3. 健全质量评价机制，加强专业动态管理。

质量评价是高等院校专业建设动态管理的关键环节，完善的质量评价机制是提升服务质量、强化科学管理的重要保证。高职院校要将专业质量建设与评价视为学校的常态性工作，完善政府部门、高职院校、行业企业、科研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职业教育专业质量评价机制，通过政府管理部门评价、学校自评、第三方评价以及社会评价等多元化评价方式提高评价内容的全面性以及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将办学条件、教育教学质量、教师专业发展、实践基地建设、毕业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企业满意度、社会服务能力等作为衡量专业建设质量的重要指标，为专业发展及其动态调整提供决策支持。高职院校要根据区域经济产业发展变化以及行业企业岗位需求变化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完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师资团队等配套建设，持续促进产业结构与专业设置、职业标准与课程结构、课程内容与岗位要求、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的有效对接。

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斯·卢曼的功能结构主义理论将社会系统视为一个基于组成要素和相关关系，并与周围环境构成多层次结构体的动态调整体系。高职院校专业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开放的系统，建立科学规范的专业动态管理体系对于提升产业发展的适应性以及专业人才培养的针对性至关重要。2017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出台的《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除国家控制布点的专业外，学校可自主设置高职教育（专科）专业，可按照专业管理规定设置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新专业，为建立高职院校专业管理联动机制提供了客观依据。高职院校要坚持系统性、科学性、灵活性、持续性原则，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加强专业建设目标确立、标准研制、资源建设、服务保证等在内的全过程管理，既要重视对前瞻性专业和新兴专业的科学预测与合理新增，也要灵活减少甚至停招不适应社会需求和人才培养的落后专业，保证专业建设质量的持续改进，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质人才资源支撑。

“双高计划”是促进我国高职教育改革创新与特色发展的战略之举。高职院校要根据区域产业发展实际，科学确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实施分层分类培养，注重德技并修，培养具有专业特色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通过深化校企合作改革专业课程及教学体系，不断整合社会优势资源，适应社会职业标准，满足企业岗位要求；通过师资团队建设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不断提升教师的教学品质、教研科研水平以及社会服务能力；通过多元协同治理完善相关体制机制，为专业建设提供优质发展条件、实践发展平台以及动态质量评价等保障，从而全面提升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内涵及质量，推动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李梦卿，湖北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职业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62；邢晓，湖北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62）

（原文刊载于《高等教育研究》2020年第5期）

“双高”建设校的群像特征与建设启示

——基于浙江省的分析

程江平 麻来军

为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职学校和专业群，带动职业教育持续深化改革、强化内涵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国家启动了“双高计划”。2019年12月，教育部、财政部确定197所高职学校入选“双高计划”，其中56所高职学校入选为高水平学校建设单位，141所高职学校入选为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浙江省推荐的15所高职学校全部入选“双高计划”建设单位（以下简称“双高”建设校），其中6所高职学校入选高水平学校建设单位，9所高职学校入选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入选数量和位次排名均居全国前列。以浙江“双高”建设校为样本，系统梳理和分析“双高”建设校的共同属性，对把握和优化高职教育改革创新的发展路径，指导一般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主要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以6所入选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为重点，选取浙江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等高职学校为典型样本，对“双高”建设校的主要领导和“双高”建设校办公室负责人进行深度访谈，深入分析浙江15所“双高”建设校的建设方案、项目申报书和成效自评报告，在多维度实证分析的基础上，从政策目标与“双高”建设校建设实践及建设举措的比较分析中提炼出“双高”建设校群像特征，探寻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的优化路径。

一、浙江省“双高”建设校整体情况

浙江省高职院校总量少但入选“双高”建设学校的数量多、比例高。从院校数量上看，浙江省高职院校总数为49所（其中民办高职院校9所），从入选“双高”建设校占本省高职院校的比例看，浙江省以30.61%居全国第一，超过全国平均数的3倍。浙江省高职院校数占全国高职院校总量（1423所）的3.44%，入选“双高”建设校数

占入选总数（197所）的7.61%，说明浙江省高职教育的发展水平居于全国第一方阵。浙江省“双高”建设校不仅数量多，且在高水平建设学校类别中占比也高。教育部和财政部公布的“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分为4类6档，浙江省“双高”建设校中第一类和第二类占比分别为20%和15%，超全国平均水平7.25和9.85个百分点，呈现“优中亦优”状态。浙江省“双高”建设校与国家和省实施的系列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项目的努力和成效密切相关。浙江省15所“双高”建设校中，有12所高职学校入选国家示范性（骨干）建设计划和创新发展计划的建设单位，其余3所“双高”建设校则入选了浙江省的优质暨重点校建设计划，这表明国家示范校、优质校以及省级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项目的实施，对国家“双高”建设计划的推进和高职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起着重要推动作用。

二、“双高”建设校的群像特征

浙江“双高”建设校的数量、结构、类型和类别分布在“双高”建设校群体中具有典型性，研究分析浙江“双高”建设校，可探寻“双高”建设校的共同特征，发现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的一般逻辑。

（一）认识：全面推进与重点建设统一

“双高”建设校都清楚认识到“双高计划”旨在全面推进高职院校内涵建设，是“面”上的建设项目，标志着高职教育进入了从“点”到“面”，全面推进内涵建设的新阶段。“双高”建设校均坚持用整体、系统、发展的理念去指导和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以重点项目建设和相关建设任务的完成来全面推动内涵建设，以“窗口”标准和“龙头”实力打造高水平高职学校。一是系统推进，注重学校各建设目标的高质量达成，强调各建设内容高水平协调发展，杜绝单兵突进式的建设模式，体现高质量发展的态势和追求。二是强调校企合作机制和平台建设共进，均

将推进产教深度融合和校企深度合作作为建设高水平高职学校的核心，同时始终不忘校企合作的初心，推动校企深度合作反哺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如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在打造校企合作实体平台时，突出“公司”的教学属性，积极构建“产业学院+集团/联盟+教学公司”产教融合的新生态平台。三是强调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和学校治理能力的互相推动，将其作为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的抓手，推进高水平高职学校的高质量发展。如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遵循“以产业链寻专业群、以专业群建二级学院”的逻辑，实施“以群建院”，将二级学院由教学单位向办学单位全方位转变，构建开放、协同、灵活、高效的治理结构，推进学校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四是强调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共同推进，抓牢师资队伍在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如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打造“双师双能双语”教师队伍，积极开发“双影响力”专业群带头人标准。相关举措都以“外引内培”和深化人事制度改革为抓手，坚持服务教学为本，创建结构化团队为基，保持师资队伍建设与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同频共进。

从全面推进内涵建设高度，抓重点项目建设，将全力打造高水平专业群作为学校全面推进内涵建设的“牛鼻子”，已成为“双高”建设校的共同认知。建设高水平专业群是高职学校主动适应产业发展和市场变化的直接体现，“双高”建设校打造高水平专业群的方法各异，但具有相似的认识和流程。首先，确定专业群组群逻辑，优化学校专业群整体布局。“双高”建设校无论是按岗位群逻辑、知识逻辑、人才培养定位逻辑，还是按产业逻辑、专业构成逻辑来组群，均有明晰的组群思路、组群方式和布局规划。如杭州职业技术学院提出的组群逻辑是基于“产业链-人才链-教育链”重新调整专业群布局，构建“职业岗位相继，技术领域相近，专业基础相通，教学资源相融”的新型专业群。其次，将课程建设作为打造高水平专业群的核心，积极构建支撑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高职院校办学的核心任务是人才培养，‘双高计划’的目标之一是建设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因此，在‘双高计划’建设阶段继续强化课程建设是高职院校

必须实施的建设项目”。如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将原来以专业为单位进行课程开发转变成按专业群对课程进行整体设计，建成“底层课程共享、中层课程互融、上层课程互选”的课程体系。再次，注重专业群的动态调整机制建设。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以人工智能等为分析手段，发现专业群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与对接产业链实际需求之间的偏差，建设专业群结构与产业结构吻合的预警和动态调整机制。最后，不仅将高水平专业群视为教育实体来建设，更视为办学实体来推进学校治理体系改革。如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发挥专业群的集聚服务功能，适时嵌入产业新技术、新规范、新标准，重构人才培养方案与课程标准，校企双元共建专业群教学标准体系。

（二）实践：发展理念与扎实行动一体

融入区域经济发展已成为“双高”建设校制定高质量发展建设举措和推进创新实践的行动指南。匹配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特色，契合学校发展实际和优势，将发展理念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办学思想和建设思路是“双高”建设校的显著特点。“融”字在浙江省“双高”建设校办学理念表述中高频出现。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基于学校处于宁波港口城市的区位优势，提出“融港链天下、智创领未来”的发展模式，强调学校体制机制改革要融入宁波港口城市以及港口经济发展，聚焦产业高端和高端产业，助力宁波“智造强市”战略，打造具有港口特色的专业群。

求真务实是浙江地域的文化个性。强调实践改革创新与办学理念革新的同步推进，是“双高”建设校强化内涵建设的共同遵循。浙江省“双高”建设校不仅有科学的“融”发展理念，更有将“融”理念落地的项目载体和创新的行动路径。一是指导思想上的错位发展战略。职业教育办学方向、区域经济特点和高职学校现有资源使高职学校错位发展存在必要性和可能性。浙江省“双高”建设校都围绕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在尊重学校建设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探寻本校的独特资源优势，以错位发展提升学校独特价值，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如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提出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要从战略上明确“做什么”“为什么做”以及“怎么做”，科学决策，理性取舍，清晰定位，寻求错位，从现有资源中实现

整合与优化，挖掘潜力，不断提升学校的核心竞争力。二是体现在学校文化建设方面。“文化建设标杆校”是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的身份标识，学校坚持深厚的行业办学文化积淀和“办学校就是办文化”的办学理念，通过构建实施学生“千日成长”、教师“千万培养”和校友“千花盛开”的“三千”工程，建立学生、教师和校友三者成长和互动机制，建立诚信文化立身、金融文化立业，校友文化立世的三维文化育人行动系统，建成了文化建设、文化育人、文化治理一体的学校文化体系。三是体现在推进产教深度融合方面。浙江省“双高”建设校在有效需求导向下，遵循教育规律和产业发展规律，根据市场运行机制，以利益为基础，推动校企合作由人或产品为纽带转向机制为纽带，探索出校企深度合作的多种有效路径。如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在办学基础相对薄弱阶段，通过校企利益捆绑，创建学校主动服务企业的校企合校“友嘉模式”，推动学校迈向高质量发展之路。随着学校办学水平和技术服务水平的提升，学校依据打造品牌专业和行业离不开的高职学校为导向，依托学校特色专业，推进“三教改革”，选择主导产业的主流企业为对象，推进校企合作进入“达利现象”阶段。“友嘉模式”和“达利现象”的不断深入，使得学校有能力和企业共同制定企业标准和人才标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进科技进步，使校企合作走深走实。四是重视标志性成果在学校培优提质上的导向作用。标志性成果在全面内涵建设中具有聚焦和引领作用。“双高”建设校都积极发挥围绕职业教育质量提升，凸显特色优势，有明确的标志成果建设要求，使建设目标达成可评价、建设进程可追踪、力量可集聚，激发学校建设项目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整合和高效利用各种办学资源，扩大学校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三）成效：类型特征与学校特色彰显

强化高职教育职能和属性，强调学校发展融入区域发展，专业发展融入产业发展，构建职业教育类型发展之路，是“双高”建设校的共同坚持。

突出职业院校特色发展之路，对接区域产业特色和行业特征，化办学优势为办学特色，打造有美誉度、识别度、竞争力和辐射力的高职品牌校是“双高”建设校的共同追求。学校品牌是一

种有竞争力的特色，特色的彰显和品牌的打造是互动的过程。首先，“双高”建设校注重形成有别于其他高职学校的风格和特点，并使其成为自身的独特符号。如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在国际化办学上先人一步，扎根本土，以国际化为改革动力，倒逼学校办学机制改革，促进学校向国际化高品质高职学校发展。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形成融入区域创新体系建设，面向中小微企业提供技术创新服务独特的品牌标识。其次，在内涵建设的路径和方式上彰显“双高”建设校特色和品质。如在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方面，浙江省“双高”建设校都认识到，要促使职业教育产教关系真正从浅层次的“合作”向深层次的“融合”过渡，既需要实现从校企合作思维向产教融合思维的转变，也需要实现办学模式核心要素的系统创新，但各校在发展历程和推进方式上各有不同。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合作三阶段是从“校内基地生产化、校外基地教学化”为核心的“基地两化”模式，到以专业为单位，关注学校社会服务能力提升为特征组建“校企利益共同体”阶段，再发展为集一体化设计和实体化运作为特征的“产教综合体”形态。而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则走过以主动向企业推销，校企利益捆绑为特征的“友嘉模式”，到以获得行业高度认可，人才供需对接为特征的“达利现象”，再到以解决企业痛点，构建产教融合生态的“特种方案”等三个阶段。

三、“双高”建设校的建设启示

（一）求实是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的出发点

正视现实，承继办学历史，发挥办学优势，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办学之路，将“求实”作为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的出发点，探索新时代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群的建设之路，是“双高”建设校建设的一大启示。

求实是指高职学校本身的客观条件制约着战略目标的确立和实现，只有一切从学校的实际出发，分析自身的发展条件，找准自身的“位置”，在继承中发展，在传承中改革，从自身的建设条件和资源潜能出发，持续扎实的行动，将学校融入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提升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撑力和贡献力，才能打造学校办学特色，形成学校品牌。

高职学校的客观条件首先是学校办学发展惯性决定其所处的发展阶段，现有基础条件和竞争优势，包括办学定位、历史发展惯性、自身基础性优势。正如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回答“学校成功入选‘双高计划’优势在哪里？”这一问题时，提到“我们优势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基础很扎实”。其次是高职学校在高职教育独特生态系统所处的位置，特别是在系列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项目中的位次和建设过程中积蓄的比较优势和学校特色。在自2006年开始实施的三轮高水平学校建设项目中，高职学校逐渐明晰位于不同类别与档位而形成的发展定位，并继续强化提升各自独特资源与特色的统筹能力。三是强调高职学校功能位置的作用发挥。在高职教育独特生态系统中的功能位置既受学校办学实力和质量影响，也受其在系列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中的位次影响。“双高计划”项目的定位是“舞龙头”，“龙头”的功能定位既是入选“双高计划”高职学校的地位和作用的规定性，也是其发展目标、建设任务、建设内容的客观制约因素，在制定建设方案中要坚持学校发展目标与“双高计划”发展目标的统一。

（二）创新是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的着力点

抓住职业教育类型特色和学校办学质量提升的本质要求，不断改革创新，将创新作为高水平高职学校的建设的着力点，承担起“双高”建设校引领改革，打造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品牌的重任，是“双高”建设校建设的又一重要启示。

创新是指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从理念到行动都要展开深入的革新，引领高职学校建设从点的突破到系统的变革，随新技术、新工艺、新模式、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要求而不断改革创新，把握住不同建设项目的本质属性，而不是将全部精力聚焦项目遴选指标达成，不迷惑于不同遴选项的指标差异性。

高职学校坚持改革创新理念和行动同时推进，在职业教育发展规律和产业发展规律基础上，基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区情”和校情，保持定力，不唯上、不唯指标，不因一时一地的扰动因素而频繁变化。一是建设指导思想要革新。

“双高计划”不是几个项目建设或完成几个建设任务，而是高职学校全面质量提升。“一加强、

四打造、五提升”是“双高计划”建设的内容，但不是建设的全部，要从显著提升高职学校和专业群办学水平、服务能力、国际影响力的整体去谋划、设计、编制建设方案。二是建设路径要创新。“双高计划”建设目标和定位决定其建设路径必须不断改革创新。在“云物大智”时代，要善用新科技赋能新职教。校企合作模式要随校企的需求和合作的深度、实力而变，师资队伍建设机制要应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群的质量而变。

“双高计划”建设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决定建设路径必须在互构中不断优化。互构性是指在高职学校推进建设进程中，不同的建设内容在彼此互动中相互调整、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共同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三是必须要持续行动、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改革创新顺利推进和科学规划、久久为功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系统、科学的规划是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实践的航标，有效的行动和持续推进是让改革发展蓝图成为现实的基础。

（三）高质量是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的归宿点

从国家示范（骨干）校建设，到优质校建设，再到“双高计划”，并不是简单的优中选优，而是以持续的政策供给，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推动职业教育发展。抓准“双高”建设校的定位，致力于打造职业教育的“龙头”，坚持质量为先，引领改革、支撑发展，明确绩效目标，推动学校和专业群高质量发展，全面打造学校特色和品牌，将高质量作为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的归宿是“双高”建设校建设进程中的重要启示。

高质量是指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群的建设质量要转化为核心竞争力，实现办学资源效能的最大化，满足政府、企业、学校、学生等办学利益相关方的多元化需求。高质量不仅是一种理念和追求，更是实践层面的扎实行动。

高质量强调“标志性成果”获得和建设进程优化两者并重，以扎实行动和最优进程来实现最佳效能。一是强调“双高”建设校的建设方案详实可执行。建设方案作为“施工图”，要聚焦学校高水平发展，确定学校的改革任务与举措，重点落在“一加强、四打造、五提升”十项建设内容上，但又不能限于此，要推动建设从规程走向标准，推进高职学校和专业群从特色走向品牌。

“双高”建设校的建设方案要有明确的责任主体、可监控的建设进程、可执行的建设标准、可评价的建设成果和强有力的保障体系。二是强化目标导向，成果激励。“双高”建设校要注重建设过程的实效性，以目标达成度检验建设进程的合理性，以成果质量和数量判断行动的效率。建设目标是建设行动的方向，建设成果是建设行动效能高低的表现之一。“双高”建设校要积极发挥标志性成果在全面内涵建设中的聚焦和引领作用，围绕职业教育全面质量提升，凸显特色优势，将发展目标、阶段任务和标志性成果统一，使目标达成可评价、建设进程可追踪、力量可集聚，激发学校建设项目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整合和高效利用各种办学资源，扩大学校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三是重视标准体系建设，提升示范引领能力。“双高”计划

不是某个点或面的建设，而是全面推进内涵建设，建成“龙头”型的高职学校。标准体系建设既是“双高计划”定位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达成最大成效的重要方式。“双高”建设校建设过程中，每项建设任务中既有目标规定性和成果的量化要求，更要突出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体系和职业教育培训标准体系的建设。

系统分析浙江省入选国家“双高计划”高职学校的群貌特征，既有助于全国省级“双高”建设校建设工作的推进，也为各高职学校全面推进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提供经验与启迪。

（程江平，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浙江杭州 310012；麻来军，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浙江杭州 310012）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1年第2期）

（上接第15页）

技术职务；师资素养能力方面，高水平双师队伍指学校专任教师不仅具备理论教学素质，也具备实践教学素质。无论是第一种类型还是第二种类型，都强调高职学校教师应兼具理论与实际的综合能力与专业素质。从未来建设发展看，高水平双师队伍应紧跟产业发展与政策导向，着力培养有权威影响力的专业群带头人、能解决生产难题的骨干教师、具有良好技艺的技术技能教师及行业企业背景的兼职教师。

专业群带头人作为专业群建设的引领者和构建者在双师队伍建设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专业群带头人既可以在发展潜力较大的专业带头人中选拔，也可以吸引或聘请政府和企业的高技能人才。骨干教师是高水平双师队伍建设的中坚力量，可通过课程组和项目组的形式，围绕产品开发、工艺改进、技术升级、解决企业生产、管理等技术问题组建项目组，以团队的形式培养。技术技能大师作为各行业技艺传承和创新的承载者，可多措并举通过建设诸如传承绝技绝艺的技能大师工作室、创新技术技能平台以及大师培养机制等方式全面打造。兼职教师可以通过搭建产教融合平台、创新制度建设与组织建设，吸引和

聘请政府、行业、企业等校外人才资源，以按需聘用、注重实效为基本原则，结合学校实际情况予以分类管理。

“双高计划”作为高职教育改革发展与特色的创新的顶层设计和施工蓝图，不仅彰显了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下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变迁，同时反映高职学校战略定位与预期目标提升。新时代“双高计划”学校建设只有立足时代动向，把握发展机遇，优化发展格局，统筹高水平学校和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间的辩证关系，实现人才培养逻辑、社会服务逻辑、院校发展逻辑全方位变革，同时在聚焦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技术创新服务平台打造、高水平双师队伍构建三方面展开实践探索，才能丰富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特色与内涵，实现人才培养质量全面提升。

（刘文杰，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浙江杭州 310000；陈亮，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通讯作者，陕西西安 710000）

（原文刊载于《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1年第2期）